学校代码 10530　　　　学　号 201510020091

分 类 号 K21　　　　密　级 公开

湘潭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之演变

学位申请人 黄尧慧

指导教师 李斯 博士

学院名称 历史系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 秦汉史

二〇一八年 五月

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 Han Dynasty

Candidate Huang Yaohui

Supervisor Doc. Li Si

College History

Program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Specialization the histor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Degree Master of History

University XiangTan University

Date May.2018

湘潭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黄克慧　　　　日期：2018年 5 月 30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湘潭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涉密论文按学校规定处理。

作者签名：黄克慧　　　日期：2018年 5 月 30 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18年 5 月 30 日

摘 要

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两汉时期中央王朝逐渐和西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政治方面，通过使者这个媒介，双方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交往活动中；和亲女、质子、官吏则是使者外交职能的分化，即按外交任务的不同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能，联姻和纳质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维系了双方的交往关系，置吏是与西域关系在职官上的反映，从而确立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军事方面，双方通过武力威胁和战争这两种方式进行较量，其主要差异在与外交成本和外交效果，当武力威胁已经难以对西域诸国形成有效控制之时，就会升级为战争。两汉的屯田之策，则为控制战略要道、稳定后方提供了保障。经济方面，表现在农牧业、工商业等领域的东西互动，一方面是商品的交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央王朝灌溉、冶铁等技术的西传，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是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综合体现。文化方面，受民族融合的影响，促进了两汉时期艺术的繁荣，在杂技、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都有体现；西域国家在深受汉王朝礼仪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中原地区人们生活方式也发生一些变化；除此以外，佛教传入中原，并逐渐由上层阶级走向民间。

通过综合运用以上外交手段，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开始发展于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全盛于宣帝神爵三年西域都护设立和开府，衰落于平帝末年，到新朝末年西域与中原断绝联系；东汉时期，以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击匈奴为标志，中央王朝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和帝永元三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顺帝永建六年班勇恢复伊吾屯田，是东汉王朝经营西域的达到发展高峰的两个标志，安帝以后，随着中央王朝自身的动荡，其经营西域政策逐渐走向崩溃。尽管两汉时期的对西域的外交政策颇有沿袭，但由于经营目的和时代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其在政策稳定性、经营主导、使者功能性、竞争对手等方面存在差异。

关键词：汉朝；西域；外交；使者

Abstract

Since Zhang Qian's first arrival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Han Dynasty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the military , the economic and the cultural side.

On Political re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greatly developed through the messenger, especially in the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re were three divisions of diplomatic functions which were female from the Han Dynasty, hostage and the officials,which are given special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plomatic tasks. United by marrying daughters or being held as a hostage which hol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and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which set the established of the Feudal dynasty 's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On Military respect, there was a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threat and war,which had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and effects.When the Han Dynasty became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threat would become the war. Over the Han Dynasty,the garrison reclamation system prvide for the control of strategic route and military material support.

On Economic respect, diplomatic activities happened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On the one hand, there have a commodity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learned our Iron Working and irrigation technique,while the "Silk Road" is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Cultural respect, influenced by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have changed in acrobatics, music, painting ,sculpture and so on.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in the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eriod of time, there w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rom th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entral China and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upper class to the folk.

In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 showed a periodic chang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ed in Zhang Qian's first arrival in the Western Regions. When the Protectorat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set up in 59 B. C. , It reached the peak of the relationship.The relationship broke down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wo government resto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73 B.D，which influenced by Xiong Nu.After Ban Chao became Regions Frontier Command in 91 B.D，Ban Yong recovered the Garrison Reclamation in Yi Wu（伊吾）, there were two peak period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 Emperor An of the Eastern Han, the ruling crisis led to snapp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lthough the foreign policy of dealing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has been repeat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plomatic aim and the scenes of an age led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cy, the management, the function of the envoy, the competitor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 the Western Regions ; Diplomatic Relations ; Messenger

目 录

第1章 绪 论

1.1 选题缘由

两汉时期，帝国疆域的主体范围大致奠定，并且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往，匈奴、西域、西南夷、南粤、闽粤、朝鲜，以及东汉的乌桓、鲜卑都是汉王朝的外交对象。本文以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同西域地区的交往作为切入点，以期窥见汉代外交体系一斑。自张骞凿空西域，中央王朝开始了同西域的外交活动，“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在狭义基础上还涵盖了亚洲中、西部地区等。本文所研究的“西域”取其广义。

对于两汉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前人已留下许多宝贵财富，或有通博的史学家涉猎这一块，也不乏学者钻研西域文化。本文将对西域的研究角度放在了外交，既容易掌控文章的论述篇幅，又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把握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个体特点。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域使用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对西域外交的基本格局，对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亦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研究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本文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对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交往内容的梳理。这是研究的主体部分，只有理清交往的具体内容，才能更好的研究其发展动态，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归纳。其二，探索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同西域关系的变化发展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力决定在外交中所处地位，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寻找在外交中阶段性的变化。其三，对两汉经营西域的目的的探讨。抵抗匈奴是汉朝同西域开展外交的初衷，然而在日逐王降汉后，汉朝并未放弃对西域的经营，汉王朝的周边亦没有一个强大到与之匹敌的国家。此种情况下，必然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吸引着汉朝在西域经营。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些启发，本文将从思想层面重新审视两汉经营西域的目的。

对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的发展变化阶段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实施具体外交措施的内涵，或能为研究两汉经济发展阶段提供若干佐证。

1.2 研究现状

一、民族关系及边疆史方面

有关西域问题的研究，在1949年之前便有学人关注。其中，曾问吾《中国

经营西域史》[1]成书于民国时期，该书系统研究了新疆历代沿革开发的历史，上溯汉代，下止民国，成为对中国历代经营西域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对西域做了相对准确的划分，提出了“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而以汉、唐、元、清四朝为标准，汉唐之西域又为狭。书中还提出汉朝至明朝是“中国国力大扩张之时代”的观点，是中央王朝积极开拓西部边疆的年代。外国专著多为日本历史学者所作，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2]一书是关于新疆、中亚历史文化的经典著作，其对西域语言、历史、文化均有研究。在对西域文明的研究上，作者认为西域文明的本质是西方或回教，而非中华文明，汉文明未能使西域的文明转向(即同化)，是因为存在着文明的“优劣之差”，而“西域之中国古代文明，要为西域之中国人的文明”。藤田丰八《西域研究》[3]论述了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史，叙述详细，考证精当，是日本中亚史研究的早期经典著作，在西域史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20 世纪以来，一大批优秀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不断出现，加之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以及相关出土文献的发掘出土，丰富了对西域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材料，因此，相关史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4]开创了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的先河，是首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专著。书中提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这一新概念，并架构了一个不断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体系，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制度相区别。本书认为:“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涉、交往的政治行为。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内政的延伸，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5]认为西汉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民族多制度的统一封建国家，并在东汉时得到巩固。两汉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在与建制，即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西域都护等管理的设置就是汉王朝在西域统治的重要组成。田继周《秦汉民族史》[6]则对各个民族的历史兴衰一一梳理，从西域各族民族成分、社会制度以及文化风俗几个方面着手，深入剖析了汉与西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安作璋《西汉与西域关系史》《两汉与西域关系史》[7]对两汉统一西域的经过、西域都护等行政机构设置以及两汉与西域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西汉王朝中叶开始，今新疆广大地区就已列入中国的版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8]是一部依托《史记》和《汉书》的军政线所作的“狭义”

---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

② (日)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

③ (日) 藤田丰八著《西域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 1935 年出版。

④ 黎虎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⑤ 木芹著《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⑥ 田继周著《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⑦ 安作璋著《西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安作璋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 1979 年出版。

⑧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西域通史，遗憾的是，该书对于社会、民生、风俗等方面却较少涉及。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①]系统整理了以往对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并对张骞、甘英等人西使、通西域的路线、戊己校尉以及吐鲁番文书有关年号等若干重要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关于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断代史著作中也有提及，如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修订本）》[②]等。

汉王朝依靠强大的国力，积极开疆拓土：北击匈奴，南平东瓯、闽越与南越，西通西域、平西羌，西南通西南夷，东北灭卫氏朝鲜。因此，多有从边疆、民族角度描写对外交往的论文，如吴廷燮《论汉代开拓边疆之盛》，史念海《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顾颉刚《自〈禹贡〉至两汉对于异民族之观念》[③]，李溥荫《两汉对外之发展及其教训》[④]认为两汉向外发展的关键既在于外部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压力，又在于内部的大一统趋势，同时，皇帝的手段、使臣将帅的能力都是关键所在。"华尊夷卑"的民族观念影响着在对外政策上民族的自信力，两汉对外政策的得失均系于此，其利在与民族凝聚力，其弊则在于容易固步自封。

有关对经营政策的文章如：曾问吾《前汉之经营西域》《汉人之经营西域与西域之文明》，朱葆珊《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高荣《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⑤]等文。殷晴《汉唐民族政策述论》[⑥]对汉唐时期中央政府统治西域的措施进行了归纳，认为其政策是安定宽和的，具体表现在：增加了大量军事费用，却并没有加重西域人民负担；而耕战结合的方式不仅有利于保持丝路的畅通，也对减轻当地人负担、维护西北边疆稳定有决定意义。高云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⑦]提到了"大一统"思想在对外军事上的应用，适应了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王玉功《简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⑧]阐述了汉武帝时期内政外交手段为后世所沿用，指出其疆域政策的首创性特点。马晓丽《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⑨]总结了汉宣帝、赵充国、萧望之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观点，汉宣帝的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力求构建一种"万国伏，

---

①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② 林剑鸣、赵宏著《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③吴廷燮《论汉代开拓边疆之盛》，《四存月刊》1921 年第 8 期；史念海《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文史杂志》1942 年第 2 期；顾颉刚《自〈禹贡〉至两汉对于异民族之观念》，《禹贡》1934 年第 3 期。

④ 李溥荫《两汉对外之发展及其教训》，《新亚细亚》1936 年第 2 期。

⑤ 曾问吾《前汉之经营西域》，《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 年第 8 期；曾问吾《汉人之经营西域与西域之文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 年第 190 期；朱葆珊《试论西汉时期汉在西域统治的确立和汉匈统一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高荣《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1 期。

⑥ 殷晴《汉唐民族政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⑦ 高云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⑧ 王玉功《简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 年第 2 期。

⑨ 马晓丽《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贻长久”的民族关系，赵充国的主要观点即以夷击夷、分化瓦解诸羌同盟、威德并行，萧望之民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不伐丧、让而不臣。崔明德《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①，虽然哀帝朝西汉王朝已到末年，但其民族关系思想却并非全然消极，中央王朝仍然十分重视汉匈关系以及边境安宁问题。上官绪智在《“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②梳理了“以夷制夷”之计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形成于西汉前期，实践于汉武帝时至西汉后期，大规模运用于东汉。有关王莽时期的民族政策，陈立柱在《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新论》③中认为新莽朝和周边民族关系的破裂，是西汉后期各种矛盾交互的结果，王莽的民族政策是为其改制服务，他与各国的冲突也不是由王莽所发动，史学家对王莽所存在的偏见或受班固撰写《汉书》的影响。

二、外交具体措施方面

政治上：在对西域政策研究上，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④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和亲的学术著作，本书著者认为，和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它包含婚姻、家庭、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且与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时间、出嫁者、出嫁者身份及对象几个方面总结归纳为“汉唐和亲简表”，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论文方面，和亲始于汉初，是两汉对西域交往的重要措施之一，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⑤一文，开对“和亲”研究的先河。1949年以后，许多史学家研究和亲这一政策，如：敬东《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朱振杰《中国历史上和亲的类型及作用》⑥都赞成将和亲分为消极和亲、积极和亲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三种类型。李大龙《西汉“和亲”政策新论》⑦认为学术界对西汉前期“和亲”政策研究多着眼于西汉王朝同匈奴的关系，以及政策带来的影响，而忽略了提出“和亲”建议的目的和内容。因此，通过刘敬所提出的“和亲”目的出发，认为该建议是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进攻性政策，最终企图是不战而臣服匈奴。

西域职官研究上，余太山《两汉西域戊己校尉考》⑧从隶属、驻地、名称、秩禄和人数等方面考证戊己校尉之置，并在其备员问题上支持“一员说”的观点，与之持观点相同的还有侯灿《试论西域戊己校尉》⑨等文；二员说观点的支持者

① 崔明德《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东方论坛》2006年第4期。

② 上官绪智《“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陈立柱《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新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④ 崔明德著《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⑤ 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年7月第1期。

⑥ 敬东《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朱振杰《中国历史上和亲的类型及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⑦ 李大龙《西汉“和亲”政策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

⑧ 余太山《两汉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年第1期。

⑨ 侯灿《试论西域戊己校尉》，《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则有劳幹、黄文弼等人，如劳幹《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①]。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域关系转变的标志》[②]中提到西域都护设立之初并无管理乌孙的权力，因此其设立并不能使西汉和乌孙关系马上发生转变，真正的转变是在甘露元年（前 53）之后才逐步形成的。

军事上：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③]认为汉代大规模的西北边郡屯田始于汉武帝之时。国家对屯田卒实行供给制，屯田收获全部上缴。汉代西北屯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经济上的作用主要在于开发边地，就地生产出粮食，从而减省了从内地向边地长途转输的巨大消耗。同时，本书还关注到了和亲期间这个特殊时段的边疆问题。杨才林《古代西北屯田开发述论》[④]简要论述了古代西北屯田开发思想及特点，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屯田对西北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张运德《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⑤]从屯垦戍边的源流、目的、文化价值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两汉时期对西域屯垦政策的基本特征。

经济文化上：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⑥]等著作从经济文化角度切入。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⑦]等文从思想文化角度进行论述。丘进《略论汉代西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马国荣《两汉时期新疆汉人的社会生活》《秦汉时期西域羌族、车师和月氏的社会生活》，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黄今言《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⑧]。刘永强《汉通西域时西域各国经济构成研究》[⑨]总结了《汉书》中出现的五种西域经济构成形式：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为主、农业和畜牧业并重、依靠旁国为主、其他方式。

三、人物研究方面

许多学者从人物研究的角度着手，尤其重视对在西域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外交家的研究，如张骞、班超等，在这些文献中，通过对外交家个人的人生轨迹研究，并对其所在时代对西域的经营有所提及。如黄文弼《班超》，又有桑原骘

---

① 劳幹《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史语所集刊》1956 年第 28 期。

② 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域关系转变的标志》，《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③ 刘光华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④ 杨才林《古代西北屯田开发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⑤ 张运德《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西域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⑥ 陈竺同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 2007 年出版。

⑦ 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学思》1942 年第 4 期；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青年中国季刊》1941 年第 2 期。

⑧ 丘进《略论汉代西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1987 年第 4 期；马国荣《两汉时期新疆汉人的社会生活》，《新疆社科论坛》1997 年第 1 期；马国荣《秦汉时期西域羌族、车师和月氏的社会生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黄今言《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⑨ 刘永强《汉通西域时西域各国经济构成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藏《张骞西征考》[1]一书对张骞数使西域进行了考证。林剑鸣《汉武帝》，黄留珠《汉光武帝》，张鹤泉《汉明帝研究》[2]等帝王传记，也都有两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史的内容。

论文方面，钱基博《班超之精神生活》[3]肯定了班超的智、勇对其立功西域的影响。1949 年以后，除了传统的对张骞、班超作研究以外，学者们还关注了其他外交家如：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莫任南《论傅介子出使西域的历史功能》，姚景洲、李艳华《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4]。此外，对人物研究的深度也增加，除了对人物生平的考证外，还联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谈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如：马元材《自张骞至班超之丝路经营》，莫任南《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5]。近年来在人物研究方面，王庆宪《西汉遣往匈奴、乌孙的和亲使者》[6]反驳了学术界有悖于“昭君精神”的观点，并强调实现民族团结、和平友好并非由个人力量所决定，而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王宏谋在《月氏西迁与张骞西使新论》[7]中提到张骞出使西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王锋《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8]涉及到了生态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观，这一角度比较新颖。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9]提到了班彪的“羁縻”思想，这与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密切联系，以期实现东汉王朝对匈奴的控制。

四、史地史和其他方面

史地类：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10]等著作从个案入手研究西域与中原地区的关联。

史地类相关论文有郭庆龙《西域诸国考略》，陈仲益《〈西域记〉释地》，冯承钧《西域地名》《楼兰鄯善问题》，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

---

① 黄文弼著《班超》，重庆胜利出版社 1945 年出版；（日）桑原骘藏著《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

② 林剑鸣著《汉武帝》，三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黄留珠著《汉光武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张鹤泉著《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③ 钱基博《班超之精神生活》，《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 年第 1 期。

④ 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新疆大学学报》1977 年第 4 期；莫任南《论傅介子出使西域的历史功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姚景洲、李艳华《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东南文化 2000 年第 3 期。

⑤ 马元材《自张骞至班超之丝路经营》，《河南政治月刊》1941 年第 11 期；莫任南《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湖南师院学报》1980 年 6 月第 2 期。

⑥ 王庆宪《西汉遣往匈奴、乌孙的和亲使者》，《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⑦ 王宏谋《月氏西迁与张骞西使新论》，《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⑧ 王锋《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⑨ 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⑩ 明哲、王炳华著《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张广达、荣新江著《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 1993 年出版。

国》[①]。外国学人的研究有：松田寿男《汉魏时代之河西》，崛谦德《于阗国考》，西村真次《乌孙与汉之同盟》，桑原骘藏《大宛贵山城考》《张骞西使考》[②]。

古籍研究：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③]从历史文献研究角度出发，在史地上进行了考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④]考历代《西域传》撰述，并做了详尽、系统的注解，有助于学人对西域关系史研究入门学习。

其他：胡平生、张德芳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⑤]一书，从出土史料方面为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材料，通过敦煌悬泉驿的出土文书真实再现了汉代与西域外交关联，有助于学者们对此进一步研究。

外交思想方面，文兴《汉武帝抗击匈奴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汉武帝时期在抗击匈奴问题上的两条线路斗争，并认为这其实儒与法之间的斗争。

文献述评方面，有朴民《〈汉唐和亲研究〉介评》，岳纯之《评〈汉唐和亲史稿〉》，周伟洲《民族政策是边政问题的核心：〈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评述》[⑦]等。

1.3 理论和方法

本文主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论文构思及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如下几种研究方法：

一、动态比较法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将有效信息提取并进行总结归纳。如在第2章中，从史料中找到对交往的具体内容的记载，并分类别论述。此外，还运用了纵向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西汉、东汉之差异作出比较。

二、个案研究法

从个案着手，由点到面分析。对交往方式逐一突破研究，进而再对西汉、东

① 郭庆龙《西域诸国考略》，《史地丛刊》1923年第2-3期；陈仲益《〈西域记〉释地》，《北京大学研究年国学月刊》1926年第7-8期；冯承钧《西域地名》，《西北研究》1932年第2期；《楼兰鄯善问题》，《辅仁学志》1932年第2期；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西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国》，《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

②（日）松田寿男《汉魏时代之河西》，静蓉译，《中和》1942年第7期；（日）崛谦德《于阗国考》，纪彬译，《禹贡》1935年9月第4期；（日）西村真次《乌孙与汉之同盟》，东白译，《史地半月刊》1936年第1期；（日）桑原骘藏《大宛贵山城考》，何建民译，《边事研究 1935年第4期；《张骞西使考》，何铁山译，《亚洲文化论丛》1944年第3期。

③ 岑仲勉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④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⑤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 文兴《汉武帝抗击匈奴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西北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⑦ 朴民《〈汉唐和亲研究〉介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岳纯之《评〈汉唐和亲史稿〉》，《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周伟洲《民族政策是边政问题的核心：〈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评述》，《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

汉同西域关系的发展分别做出整理，形成对两汉与西域关系发展的宏观的认识。

三、二重证据法

本文研究依据除传世文献外，还从西北边地出土文献（如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等简牍材料中寻找证据。

1.4 研究意义

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梳理了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和西域的交往方式，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这些具体外交措施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演变规律。根据本文对其动态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两汉王朝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中央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并呈现出响应的波动式变化，因此对外交政策的研究或能成为对同时期政治、经济史阶段性变化研究的佐证。

同时，对于两汉时期与西域关系的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下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理念。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同西域交往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张骞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不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以经济为纽带，实现了政治、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浸润，自身也吸收了外国的文明的成果，因此从历史渊源中便可以找到中国同丝路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互利共赢的证明。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热爱和平的大国，丝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同中亚、西亚等地区友好文明的象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发掘，更能理解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当下谋求国际合作新探索的选择，[①]它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全新正能量。

1.5 创新与不足

史学研究中对于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的运用十分重视，自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学科规范及相关理论体系。研究两汉对西域外交是一个较为传统的命题，前辈学者对西域史的研究成果中不乏珠玑，运用新史料更容易得出新结论，但是这种机会十分难得。本文将从旧有史料出发，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现有史料中和西域外交相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力求更深入地剖析现有资料。除传世文献外，还会从西北边地出土简牍材料中寻找证据。在两汉对西域外交研究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问题上，如何使本文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区分，我选择了在论述角度的新意上下文章。新视角的采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传统研究领域（如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的认识水平，近年来，在隋唐五代史、宋辽西夏金元史研究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范例[①]。本文将对西域的研究角度放在了外交，既容易掌控文章的论述篇幅，又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把握汉与西域这两个个体的特色。

关于两汉与西域关系是否有规律可循，早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东汉时便有“三通三绝”的记载。但所谓“三通三绝”是否准确，“通”和“绝”之间是否有划分界限，“通”和“绝”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外交状态，不弄清这些问题，仅四个字实在难有说服力。并且，只研究东汉一朝是不够的，还需要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西汉乃至新莽时期。自西域凿空，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同西域关系的发展好比一条从“零”开始发展的线条，因此本文要做的就是在历史的时间轴上呈现这条线的变化，截取从西汉至东汉灭亡这一时间段的断面，而各个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时间段两汉同西域关系是如何发展，以及几次高峰段的比较，这些就需要进一步的对史料研究和梳理了。研究其阶段性的变化发展，既是本文重点需解决的疑问，其实施又是本文的难点，难在对史料研究范围的确定以及后续的查找分析上，既要避免将局面铺得太大而脱离本文主旨，又要避免陷入某个点钻牛角尖，总之需要树立起全局观念来看待问题，还需要发现其他佐证性的资料。在探索两汉对西域外交演变规律时，本文采取了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比研究更能从差异中体现出时代赋予的烙印，从而更好的理解其特点、成因及影响。两汉相仿之处很多，从政治延续性、版图上来说二者十分接近，再加上时间接近，正因如此，其差异性才更具有代表性，这些差异的表现、成因、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于两汉时期外交理论的阐述还不够深入，未能上升到制度和思想层面剖析外交的本质特征；比较研究方面，囿于两汉时期的西域地区，而未能与同时代其它地区或同地区其它时代加以比较分析，是本文的遗憾之处。

---

① 晁天义《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1日。

第2章　中央王朝与西域交往的内涵

关于两汉时期“西域”的概念，《汉书》中已做了界定：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①

即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为西域之所在。《后汉书》中则亦载相关内容印证：

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领。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领东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与葱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②

事实上，无论在《汉书》还是《后汉书》中，其实际描写之西域诸国，均超过了上述定义之地理范围，最远到达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后汉书》所撰安息、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大秦等国则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及南岸也纳入其中。

本文所研究之“西域”，涵盖了两汉书中所述西域诸国的范围。《汉书》所记有55个国家，分别是：婼羌、鄯善（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西夜、蒲犁、依耐、无雷、难兜、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大夏（属大月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③。《后汉书》提及东汉时，“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寘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④则东汉时西域诸国较西汉有所变化，其所记国家分别是：拘弥、于寘、皮山、西夜、子合、德若、乌秅、罽宾、条支、安息、阿蛮、斯宾、于罗、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栗弋（属康居）、严国（属康居）、奄蔡（属康居）、莎车、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1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4页。
③ 参见（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西域传》。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页。

蒲犁、无雷、疏勒、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国、车师[①]。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书中所提西域诸国，虽然在《西域传》撰写中有时会按户口划分为“大国”、“小国”，或按生活方式划分为“行国”、“土著”，但它们并不同于两汉时期的中央王朝，这些政权多是绿洲城郭政权或者游牧政权，或将之称为“酋邦”更为合适。[②]无论是何种政权形式，从正史西域传中的记载来看，西域诸国有自己的独立政权和君主是为汉王朝亦所承认的，谓之“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③]他们“佩汉印绶”，被赐予印绶的诸王相当于被中央承认的藩王，理论上发挥着拱卫中央的作用。

两汉时期，汉王朝疆域的主体范围大致奠定，并且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往，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匈奴、西域、西南夷、南粤、闽粤、朝鲜，以及东汉的乌桓、鲜卑都成为汉王朝的外交对象。两汉外交政策颇有沿袭，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开始了对西域地区的外交实践和探索，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梳理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方式。

2.1 政治方面

伴随着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演变，其交往主体由民间交往逐渐上升为官方外交，交往形式趋向制度化发展，以西域都护设置及其开府为标志，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被并入其地方行政体系中。使者是双方交往的重要媒介，其功能的变化发展是对外交变化新阶段的适应，其探索发现职能逐步削弱而政治性职能逐渐增强，和亲女、质（侍）子、官员成为一种特殊的“使者”。

2.1.1 遣使

外交使节是国家的代表，是相互交往、联系，建立外交关系，实现特定外交目的、任务的媒介和纽带。[④]张骞是最早担任外交使节出使西域之人，[⑤]武帝建元年间，为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张骞应募第一次出使：“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⑥]然而张骞的这次出使很快便受挫，以致被困于匈奴十余年，在此期间，其传中有云“然骞持汉节不失”，在汉代的外交遣使活动中以“节”作为皇权和国家的象征，使臣“持节”则代表天子亲临，一般将“节”授予正使，所谓“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⑦]。由此可见，张骞是由皇帝钦定，

① 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
② 余太山著《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30 页。
④ 黎虎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第 157 页。
⑤ 张骞在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说明早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来就已存在，但以使节身份正式出使西域，张骞应为第一人。
⑥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传》，第 2687 页。
⑦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以持节正使身份西行的。从匈奴逃出后，张骞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并由这些国家了解到其它西域国家的概况，回国后均报告给汉武帝。至此，汉王朝疆域外，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西域地区，逐渐进入汉王朝统治者的视野，不论是出于对汉匈战争的战略考量，还是对异域文化的探索需求，汉王朝欲实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①]的政治蓝图，就需要进一步发展对西域地区的外交关系。

为了适应这个需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以期联络乌孙，进而招徕乌孙周边国家向汉，起到“断匈奴右臂”的军事作用。《史记》载曰：

> 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②]

诚可见之，此次出使携带的大量财物，用于赠送给沿途西域国家，借以润滑和汉王朝的关系。使者出使西域多携带财物进行赏赐，此后皆按此制，有时更甚：“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③]这是说伐大宛之后，汉朝向西域派遣的使者的盛况，其规模之大、赏赐物资之丰厚不亚于张骞之出使。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兴起探索西域的热潮，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④]的盛况。早期出使目的在于探索发现，建功异域。张骞出使乌孙时，还曾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等国[⑤]，由所闻国变成所见国，这种出使无疑具有开拓意义，促进了中央王朝和西域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⑥]张骞本人因开拓西域封侯，成为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效仿的对象；而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皆不同于中央王朝，文化差异下好奇心的驱使也是出使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域的珍奇特产受到统治者欢迎，对西域文明的发现则丰富了汉人的世界观。当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相当了解后，使者出使之政治性更为浓厚，或为对抗匈奴，或为巩固西域，有以下几种情况：为政治、军事目的之出使，如本始二年（前 72）常惠使乌孙，即是由于前有解忧公主上书求助于天子，联合乌孙打败匈奴后，又再次出使“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为联姻之出使，如神爵元年（前 61）宣帝同意与乌孙联姻，故遣常惠至乌孙先迎娶聘；为送质子、使者等之出使，如五凤四年（前 54）魏和意、仁昌送质子回乌孙，元帝时文忠护送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6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8 页。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0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6 页。
⑤ 参见（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
⑥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3179 页。

罽宾使者返国，地节四年（前 66）乐奉护送解忧公主之女弟史返国。

除了汉王朝向西域派遣使者，西域国家亦有使者访汉。张骞使乌孙，乌孙“发导译送骞还”，乌孙使者和张骞一起回到汉朝，得以直观地认识汉王朝的强大，“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①]。对于西域诸国来说，汉王朝是遥远而陌生的，派遣使团访汉增强了其对于汉王朝的认知，甚至可以影响诸国在外交实践中的政治判断。武帝时期伐宛之战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②]，汉朝兵威促成了西域诸国纷纷使汉，扩大了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力。西域国家为达政治目的来汉，昭帝时匈奴发动对乌孙的侵略，时在乌孙的解忧公主上书昭帝求救，到宣帝继位后“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③]建议汉朝联合乌孙夹击匈奴，此番遣使就是为了寻求军事援助。又如东汉光武帝时，“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④]曾在王莽时叛汉的西域诸国不堪忍受匈奴的统治，国内同匈奴矛盾激化，于是重新渴望汉王朝的统治，故而遣使请求派遣都护以寻求汉朝的庇护。

双方互相派遣使者的记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敦煌悬泉汉简中得到印证，悬泉置位于敦煌与安西之间，是西汉时期规模较大的邮驿之一[⑤]，因其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和接送使者，便有了朝廷派遣前往西域的使者、和亲女，来自西域诸国使者访问中原进贡、受封、觐见、通使的记录，这些记载几乎都与中西交通密切相关。《康居王使者册》就有记载：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前 39），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877 简)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878 简)（Ⅱ0216②：877-883）[⑥]

该简主要讲康居王使者和苏韰王使者及贵人来汉贡献橐驼之事，根据他们的谈话内容可知，康居遣使来汉并非单独一次存在而是早已有之。早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一行人抵达大宛，大宛“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⑦]，汉使团得到了大宛、康居等国的接待，这是两国早期友好交往的证明。而对于西域南北两道诸国遣使的记载则更多[⑧]：“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鄯善王副使者卢匿等（Ⅰ0116②：15）”[⑨]，这是关于款待鄯善使者的记录；“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9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3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⑤ 史书中关于“厩置”、“传置”、“骑置”、“邮置”的名称多有记载，如《史记·田儋列传》有“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汉书·文帝纪》有“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汉书·西域传》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后汉书·西域传》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
⑥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118 页。
⑦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58 页。
⑧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使者往来与周边关系类”，第 103-174 页。
⑨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103 页。

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陵奉献（Ⅱ0114④：57）”[①]，建平是汉哀帝的年号，简牍可以反映出此时的汉王朝依然能够维系起西域来朝的景象。

2.1.2 联姻

汉初，为了建立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解除匈奴对边境的威胁，刘敬提出著名的“和亲”之策，建议联姻冒顿单于，妻以汉嫡长公主，遗以厚俸。这一建议被汉高祖接纳，虽未派出嫡长公主，但“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②]，匈奴方面则“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③]。这次和亲在稳定汉匈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从此，刘敬所提出的和亲模式基本为汉代所遵循，“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方式成为其在汉代的内涵[④]。和亲始于同匈奴之间的民族交往，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以元光二年（前133）的马邑事件为标志，“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⑤]，汉王朝不再派出汉家女联姻匈奴，与之和亲遂暂时，终止。另一方面，为了配合汉匈战争以及经营西域，汉王朝派出汉家女和亲西域。如傅介子刺楼兰王以后，立尉屠耆为王，“赐以宫女为夫人”，此举就是为了巩固新立的鄯善国和汉王朝的友好关系。更具有代表性的和亲是汉王朝和乌孙之间的和亲，汉先后遣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相夫公主出嫁乌孙，双方之和亲对于汉在西域的经营、汉与匈奴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节所论述之和亲，主要以存在汉家女出嫁西域的联姻为例，未有汉女妻之的和亲行为（尤其是东汉朝），则不在本节所涉及概念内。

与西汉相比，东汉朝与西域诸国于正史中未见有联姻。《班梁列传》载章帝时，月氏曾向汉求公主，月氏有协助汉朝攻打车师之功，又携带珍宝而来，但仍被班超拒绝。同传中班勇称鄯善王尤还为“汉人外孙”，故有学者[⑥]据此推测东汉与鄯善之间或许存在联姻。鄯善并非大国，月氏却处于较为强大的贵霜帝国时期，无论小如鄯善或强如月氏，其在东汉时期匈奴对汉无法构成强有力威胁的情况下，是否与汉存在联姻意义不大。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相一致的，东汉时的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且南部很快附汉，北部虽然滋扰汉的边境，但其对汉王朝的威胁程度已经远不及西汉时期，因此汉王朝已没有必要再联姻西域国家。

---

①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18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5页。

④ “和亲”一词先秦已有，原义为和睦相亲，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这里的“和亲”是指晋国的中行氏和范氏两个贵族家族联合对付梁氏所进行的修好活动并没有姻亲关系。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吴王）不意颇伤齐师，愿结和亲而去”，此处亦指两国彼此友好亲善。汉代刘敬“和亲”策后，和亲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周边少数民族或者各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出于各种各样和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成为历朝民族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

⑤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27页。

⑥ （日）伊濑仙太郎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研究》，岩南堂1968年出版，第90页。

2.1.3 纳质

“纳质”作为一种外交方式，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史记·殷本纪》《正义》中引《帝王世纪》云：“（商纣王）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说的就是商朝时商纣王纳当时的西伯侯长子伯邑考为质。到了春秋以后，国家之间的交质现象更为频繁和普遍，既有如同商朝时那样的一方向另一方派遣质子的单向性交质，又有两国同时派遣质子的双向性交质，如鲁隐公三年（前720）的周、郑交质[①]，鲁文公十七年（前610）的晋、郑交质[②]。

到了汉朝，尤其是东汉时期，除了“质子”以外，还出现了“侍子”的概念。按《史记》所载，宛王昧蔡被杀之后，天汉元年（前100）大宛贵人“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③]，同样的事件，在《汉书》中的记载却是“立毋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④]，据这两段史料记载，“入质”和“入侍”的基本含义是相通的。《后汉书》中，这一概念更多以“侍子”为称而少有记载“质子”，故西汉以降，“质子”和“侍子”在史书中的写法并用，到东汉时期则使用“侍子”这一概念更为普遍。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但其称呼的变化恰好体现出这一外交制度的时代烙印，《说文》记载：“侍，承也。”段注：“承者，奉也，受也。凡言侍者皆敬恭承奉之意。”[⑤]之所以呈现称呼的变化，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交质已经存在一方敬恭承奉另一方的含义。[⑥]这也正符合中央王朝同西域的关系发展趋势，两汉王朝对于周边西域国家而言处于强势地位，故少有双向的、对等的交质行为，更多的是其它国家将质子送往中原王朝的单向的、非对等的“纳质”。西汉时期，匈奴仍是汉王朝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故而有张骞通西域，企图拉拢这些西域王国，建立一种排斥匈奴的“盟友”关系，“纳质”是稳定双边关系、宣扬汉文化的重要途径。东汉时期，匈奴实力已远不如前，不能构成对汉王朝的威胁，虽然“纳质”作为一种友好往来的外交行为被保留了下来，但以往的“盟友”关系却变得可有可无，“入侍”这一称呼更能体现其外交地位的不对等性。或言之，自先秦开始出现的双向性、单向性并存的“交质”体系，到汉代逐渐被单向性的“纳质”取代，秦汉时出现统一的大帝国取代了分散的诸侯、列国，出现了外交双方外交地位的巨大不平等，从而在称谓上的表现是“质子”被“侍子”取代。

为了更直观地认识到这种变化，现列出两汉书中所见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同西域国家质侍外交情况简表（表2.1）：

---

①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隐公三年，第1723页。
②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0，文公十七年，第1860页。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9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
⑤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73页。
⑥ 黎虎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第490页。

表 2.1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同西域国家质侍外交情况简表

年代	受质方	纳质方	史料记载	质侍身份	资料出处
太初四年（前 101）	西汉	西域大宛东诸小国	“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	子弟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8 页。
天汉元年（前 100）	西汉	大宛	“汉已伐宛……宛贵人……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子	《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9 页。
征和元年（前 92）	西汉 匈奴	楼兰	“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楼兰更立王，汉复责其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立为王。”	子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7 页。
元凤四年（前 77）	西汉	楼兰	“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业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	太子	《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02 页。
五凤四年（前 54）	西汉	乌孙	“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6 页。
元帝时	西汉	莎车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3 页。
建始四年（前 29）	西汉	康居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	王子	《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08 页。
成帝时	西汉	康居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	子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2 页。
永始元年（前 16）	西汉	乌孙	“小昆弥末………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	子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9 页。
元始二年（2）	西汉	乌孙	“送乌孙归义侯侍子。”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116：S.14），编号 14，第 137 页。
建武以来	东汉	西域诸国	“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		《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930 页。

注：“年代”不单指派遣质侍的时间，也包括史籍记载中出现“质”、“侍”等关键词的时间，都笼统称为“年代”。

续表 2.1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同西域国家质侍外交情况简表

年代	受质方	纳质方	史料记载	质侍身份	资料出处
建武二十一年（45）	东汉	西域诸国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愿留侍子以示莎车……天子许之”；“建武二十一年，（车师）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	子	《后汉书》卷 1 下《光武帝帝纪第一》下第 73 页；《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4、2929 页。
建武二十二年（46）	东汉	西域诸国	“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4 页。
永平十六年（73）	东汉	于阗诸国	“十六年……于寘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永平十六年（73）	东汉	鄯善	“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子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73 页。
永平十七年（74）	东汉	西域诸国	“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西域诸国遣子入侍。”	子	《后汉书》卷 2《明帝纪》第 121 页
永平十七年（74）	东汉	乌孙	“乃以恭为戊己校尉……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子	《后汉书》卷 19《耿弇列传》第 720 页。
建初五年（80）	东汉	龟兹	“今西域诸国……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	子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75-1576 页。
建初八年（83）	东汉	乌孙	“李邑……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77-1579 页。
永元二年（90）	东汉	车师前后王	“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2929 页。
永元二年（90）	东汉	西域诸国	“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		《后汉书》卷 51《李陈庞陈桥列传》第 1683 页。
永元三年（91）	东汉	龟兹	“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侍子）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	子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81 页。
永元六年（94）	东汉	西域诸国	“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后汉书》卷 4《和帝纪》第 179 页。

续表 2.1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同西域国家质侍外交情况简表

年代	受质方	纳质方	史料记载	质侍身份	资料出处
永元六年（94）	东汉	焉耆	"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班超用计杀焉耆王广等，更立元孟为焉耆王。"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81-1582 页。
永元六年（94）	东汉	西域诸国	"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		《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82 页；《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0 页。
永建五年（130）	东汉	疏勒	"春正月，疏勒王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	子	《后汉书》卷 87《顺帝纪》第 257 页；《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7 页。
永建六年（131）	东汉	于阗	"十月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	子	《后汉书》卷 87《顺帝纪》第 258 页.
永建六年（131）	东汉	于阗	"十二月，于阗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	子	《后汉书》卷 87《顺帝纪》第 258 页；《后汉书》卷 88《西域传》2916 页。
永兴元年（153）	东汉	车师后部	"（军师后部王）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31 页。
熹平四年（175）	东汉	拘弥	"至灵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	子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5 页。
初平二年（191）	东汉	车师	"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赵）谦收杀之。"	子	《后汉书》卷 27《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 949 页。

据表 2.1，可总结两汉时期质侍外交的几个特点：一、以汉王朝为中心的单向性外交。汉王朝凭借国力的绝对优势，是受质方，西域诸国作为纳质方向中央王朝派遣质子或侍子。二、两汉时期的质侍外交突破了先秦以来的华夏文化圈，其范围已经延伸到西方文化圈。先秦以来，诸侯国林立，"交质"双方即使是国与国的外交，也始终未能脱离华夏文化圈的范畴。而汉王朝建立后，在华夏地区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王朝，随之而来的是外交圈的改变，西域诸国的地理范围最远到达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如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中下游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汉王朝通过接受来自这些西域国家的质子，开启了同古代东亚、中亚之间中西交流通道，使得传统的华夏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产生了互动，也开启了古代外交的新局面。三、质侍身份多为国君之子，甚至有以太子为质者。不过以"太子"为质的情况仅见于元凤四年（前 77）傅介子所言"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表明楼兰曾经以太子为质。由于太子身

份的特殊性，派遣太子作为质子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更常见的方式是派遣国君之子。《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此处提到了君主的兄弟也可成为质子，少数民族国家以君主的兄弟质侍人选送往汉王朝，还见于匈奴，五凤四年（前 54）“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①]，匈奴遣弟入侍之后，才逐渐开始以子质于汉。不论是上述何种身份，都是以君主之亲属为质，包括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其它地区的质侍关系，质侍身份基本上为君主之子或弟[②]，故而汉王朝对所遣来的质子身份也格外留意，有查验、核实之制。

2.1.4 置吏

汉代外交管理机构，分为专制机构和关涉机构两类。前者指以外交工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有诸卿系统的大鸿胪和尚书系统的主客曹；后者指在外交工作运转过程中起一定协调、配合作用的有关机构，散见于自中央到地方各部门。汉王朝同西域关系在职官制度的上的表现就是设置相关官吏，尤其是西域都护作为特派驻外官吏的出现，其设置和开府表现出专门处理对西域事务的地方政府的特征，与之类似，两汉时期为处理特定地区事务而设置的官职还有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

在西域都护设立之前，武帝朝已经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敦煌、武威、张掖四郡，成为连接西域和重要王朝的重要通道，汉王朝以此四镇为基础经略西域。随着交往的密切，使者往来增多，且安排在边郡的屯田事宜渐趋繁重，于是“汉置使者校尉领护”[③]，负责管理轮台、渠犁等地屯田事务，而屯田所产粮食正是为来往使者所服务的，因此，它们的设置具有极强的目的性——为处理同西域地区的使者供给问题而置。这些使者、校尉的设置表明，汉王朝在处理与西域地区的外交关系的过程中，用原有的中央——地方的行政体系处理与西域地区的关系时愈发力不从心，越来越需要在职官制度上作出相应调整，即朝着专门化的趋势发展，经略西域需要有特定的官吏进行管辖。宣帝朝，车师降汉以后，汉王朝实际上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于是“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④]，卫司马一职本是西域屯田官中的指挥官，此时还被赋予了管辖鄯善以西地区的权力。据《汉书・郑吉传》载，郑吉“因发诸国兵功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所以此处的卫司马指的就是郑吉。南匈奴降汉后，北道诸国也尽在西汉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8 页。

② 相较于汉代以前的交质活动（如春秋时期以宗室成员或臣属为质），汉代质侍的身份更能体现出质子与君主关系的“血源性”，它不再像春秋时期那样，可以用没有血缘关系的臣属充质。尤其是父子关系的体现，与当时社会价值观中的“父子”“君臣”相吻合，以子为质有利于加强受质方对纳质方的政治控制，也正因为如此，若以太子作为质子，则最能体现纳质方的诚意，也最为受质方看重。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3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3 页。

掌控下，南北两道皆为郑吉管辖，“西域都护”之设自此始矣。

西域都护代表中央王朝行使权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①]，对内属的西域城郭国家有管理、征伐、调兵、安抚、监督等权力[②]，所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首任都护是郑吉无疑，而其设置时间在《汉书》中有三种说法[③]，根据《郑吉传》：“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④]笔者认为，郑吉的都护之号，与破车师、日逐王降汉两个事件相关，并且因功被封为安远侯（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因而郑吉初次担任西域都护的时间在神爵二年破车师之后，神爵三年封侯之前，至于都护府的设立，则是在神爵三年封侯之后了。在汉王朝开设西域都护府之前，匈奴在西域设有僮仆都尉常驻焉耆，负责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随着西域都护开府，僮仆都尉亦被罢免，匈奴势力被赶出西域，实现了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在新拓展的疆域上，汉王朝通过屯田、设置亭障等措施有效的巩固了西部边疆的稳定。西汉时期，都护治所乌垒城成为中央王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都护之职基本按三年一替（也有延长或缩短）稳定的交接，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十八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有郑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十人[⑤]。到王莽朝时，中央和西域关系紧张，先有都护但钦被杀，而后天凤三年都护李崇等人出西域时遇袭，随着王莽之死，中央王朝自身尚自顾不暇，更无力经营西域了，李崇与内地失去联系。于是这个时期开始西域与中央王朝处于绝交的状态，西域都护府也不再设置。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屯田于伊吾卢地，西域与中央王朝“复通”，第二年恢复设立西域都护。不同于西汉，东汉西域都护之职时废时有，安帝时“诏罢都护”，从此不再设置西域都护，而是“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⑥]不设西域都护时，便以副校尉领护西域。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等人为了实现“震怖匈奴”这一目的而提议重开西域，这个建议为朝廷所采纳，并派遣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屯驻柳中，以行西域都护之职。吸引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国归附，虽不能复置都护，但恢复了中央王朝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06 页。

② 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③ 其一，“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38 页）；其二，“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骑都尉郑吉迎日逐”（（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8《宣帝纪》，第 262 页），明言神爵二年郑吉已是西域都护；其三，“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4 页）。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如：哈建华《有关系西域都护建置的年代问题》（《历史教学》1983 年第 3 期）；刘洪波《关于西域都护的始置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李大龙《西汉西域都护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06 页。

⑤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 年第 7 期。

⑥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1 页。

对西域地区的统辖关系。其后，西域长史移驻于阗，直至东汉末年。可以说，两汉西域都护的废立是中央王朝同西域关系发展状况的一种直观反映，西域“通”时，即使中央王朝无法再派遣西域都护一职，仍然会以其它职位来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国家权力，中央需要这样一位地方特派官管辖西域，西域也需要这样一位中央代表庇护诸国。

除西域都护以外，汉代还有其它官吏的职权也涉及到处理西域相关事务，列举如下：

屯田校尉 西域都护开府，匈奴的僮仆都尉废置后，汉王朝“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①]汉在西域设有管理屯田的屯田校尉，即伊循、车师、渠犁（西汉在渠犁的屯田始于地节二年），有“三校尉屯田”之说。此外，《汉书·西域传下》还提到了在乌孙赤谷屯田：“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也提到了三校尉屯田。

伊循都尉 楼兰更名鄯善后，鄯善王害怕“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于是请求汉使来伊循城屯田以寻求庇护，作为回应，“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②]其后汉在此设置伊循都尉，职在屯田此处，镇抚楼兰。

戊己校尉 戊己校尉是汉代屯田官之一，战时领兵作战，无战事时组织士卒在车师驻地附近屯田以自给。车师地处战略要道，是西汉抵御匈奴的一道屏障，又兼之土壤肥沃适宜耕作，故“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③]，协助西域都护防备匈奴的威胁。元帝时，郅支单于作乱，于是“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④]，文献记载的就是都护带领戊己校尉出兵讨伐郅支单于。此外，作为驻外官员，戊己校尉有义务向中央政府及时汇报西域情况[⑤]。平帝元始年间，西域通往玉门关开辟了一条新道，须途经车师后国，时任戊己校尉的徐普“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⑥]，即打算召车师后王姑句划分地界后，再向中央政府上奏开辟新道之事。东汉时，该职时置时废，治所也不断更替。明帝永平十七年至章帝建初元年，耿恭屯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屯车师前部柳中城，此后，置戊部候屯车师后部候城。但大体来说，戊己校尉的治所始终在“伊吾——车师——高昌壁”一线变动，扼住“西域门户”[⑦]，此地处肥沃之地，屯田积谷对汉军进驻西域、反击匈奴有重要影响，直接体现和确保了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4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5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4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2页。

⑤ 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⑥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4页。

⑦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4页）

汉在西域的权益和统治。戊己校尉负责协助西域都护初理西域事务，有着“屯田积谷，镇抚四方，攘匈奴而护西域”等职能，成为“抵御匈奴、安抚西域诸国的急先锋。”[①]

渠犁校尉 《汉书·郑吉传》载:“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又有悬泉汉简中“……送使渠犁校尉莫（幕）府（Ⅱ0215④：36）”[②]，简文提到“渠犁校尉”一职，可证西汉确曾在西域渠犁等地屯田，并设校尉进行管理。

中垒校尉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③]不过《史记》《汉书》等正史均无旁证证明“外掌西域”的真实性，涉及中垒校尉职掌的史料也比较匮乏，因此史学界对于“外掌西域”之记载存在较大争议，此不赘述。[④]

大鸿胪 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两件由大鸿胪主导的重要事件。其一是元康二年，乌孙求娶汉公主，萧望之以“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后狂王继位，萧望之再次陈词“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天子从之；其二是罚贰师失利后，“大鸿胪等又议……由是不复出军”。

在汉王朝设置官吏的同时，又在西域诸国间封拜君主及百官，向他们赐予汉印绶，西域“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⑤]，西域由三十六个城郭国发展至五十余国，接受中央政府册封的各级官员共有三百七十六人[⑥]。汉对西域诸国的封拜，在汉匈争夺战和维系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楼兰为例，原本它在汉匈中摇摆不定，时常帮助匈奴劫杀汉使，汉王朝“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⑦]通过册封亲汉的质子尉屠耆为王等一系列措施，将亲匈奴的楼兰国变为了亲汉的鄯善国，为汉王朝打通西域门户。[⑧]鄯善国设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等官职，显然也是在亲汉之后才可能设立，从其名称便可知悉其设置的原因也是为汉王朝在西域的战略谋划所服务的，类似的情形还有疏勒国有击胡侯等官职名称。东汉沿袭西汉，各地君长和属官都由中央政府选定任命，有时为了表示倚重和信任，还会在原有

---

① 参见赵贞《汉代戊己校尉阐释》，《敦煌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②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117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37 页。

④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垒校尉职掌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中垒校尉“外掌西城”，持这种观点的有学者李德龙所著《汉初军事史研究》；其二，中垒校尉“掌四城（门）”，学者吕思勉、滨口重国均持有相同论断；其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陈直、雷海宗、何兹全。

⑤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8 页。

⑥ 参见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⑦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8 页。

⑧ 黎虎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第 430 页。

封号外加授官号，如光武帝建武五年，立莎车王康为汉“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①]，顺帝永建二年又拜疏勒王臣磐为汉大都尉。出土资料显示，新疆沙雅县一处东汉遗迹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附录图一）印，系东汉中央政府颁发给羌族首领的官印；沙雅县还曾先后发现三颗文字相同的铜印，印文为“常口之印”，有人释为“当户”的官印[②]；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泥上印有“鄯善都护”（附录图二）字样。[③]这些官印的发现，有力的佐证了东汉在西域的行政管理制度继承自西汉。

2.2 军事方面

外交中既有和平与交往，又有暴力与冲突，国力和武力是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西域控制权的重要保障。在同西域交往过程中，汉王朝通过冲突和解决冲突逐步确立对西域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推动其政令通行西域；另一方面，中央王朝通过实施西域屯田政策为武力威慑提供了保障，屯田位置的更迭成为中央王朝对西域政策的直观反映。

2.2.1 攻劫

暴力与冲突也是中央王朝同西域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双方矛盾升级为战争之前，骚扰挑衅、劫杀使者、刺杀等行为，都是双方展示武力威胁的途径。诸国无需也无必要向汉王朝发起战争，阻挠破坏汉使者、汉军在西域的活动便足矣体现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对汉的威胁。而汉王朝出于战争成本的考量，也不会轻易用兵发动大规模战争，而代以刺杀等行为排除异己，以示其威信。随着时间推移，汉王朝出于对西域政策的需要，必然会将解决这些小摩擦提上日程，甚至演变为战争。

自张骞通西域以后，汉王朝掀起了开发探索西域的高潮，以至于“使者相望于道”，汉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加强，繁荣先进的汉王朝所带来的向心力吸引着西域地区亲汉势力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西域国家希望摆脱匈奴的统治而依附汉王朝。随着西汉经营西域规模的扩大，匈奴势力深感威胁，更加加紧对西域的控制，在没有发展为大规模战争之前，西域小国在匈奴的控制和挑唆之下与汉王朝相对抗，阻挠破坏汉与西域之间的正常交往。首当其冲的就是西域以东的楼兰、姑师，它们位于汉前往西域的第一站，正是使者往来频繁之地，所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3 页。
②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 年第 7 期。
③ 安作璋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 1979 年出版，第 100 页。

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①]西域对待汉朝使者往往要隆重招待，而面对频繁来往的使者，招待成本颇高，久而久之，两国愈发感觉困扰“苦之”，日益滋生了厌汉的情绪。为了表示对汉使的怨怼和不满，便有了攻劫汉使的行为，不仅如此，两国还协助匈奴滋扰汉的边境安宁，完全倒向了亲匈奴一边。此举既是对汉政策使然，也是地理因素使然，西域各国和中央王朝相距甚远，不甚了解彼此，如若出兵需要长途跋涉，加之以此时汉王朝和匈奴尚处在争夺西域阶段，未能完全掌控西域，匈奴势力在西域深有影响，西域诸国若有反汉之心则大有“天高皇帝远”的心态，而不担心承担其有可能产生的报复性后果（即汉王朝出兵等行为）。“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②]讲的也是如此，西域各国认为汉王朝不会轻易出兵来此，索性不再为汉使者供给食物。又如李广利伐宛之战行军中，所经诸国不愿向汉军提供食粮饮水，并且闭城抗拒汉军：

> 初，贰师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别至郁成（大宛国东境城，位于今乌兹别斯坦境），城守不肯给食……郁成窥知申生军少，晨用三千人攻杀申生等……[③]

郁成城拒向汉军提供补给，袭杀汉军，这场矛盾最后演变升级，郁成城破，郁成王逃遁康居，成为汉伐宛之战的重要一环。而汉在攻破大宛之后，西域各国对汉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改冷漠和抗拒的姿态，纷纷向汉王朝示好，逃亡康居的郁成王被康居交汉，连乌孙这样的大国，也改变了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对汉所持观望态度，向汉遣使、求和亲，逐渐成为亲汉的政权。

面对西域诸国对中西交往的阻挠和破坏，汉王朝并非完全被动，元凤四年霍光派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就是汉王朝显示威信，震慑诸国的例证。时值楼兰、龟兹数次劫杀汉使、帮助匈奴，严重影响汉王朝往来西域，傅介子“以从军为官”，昭帝元凤年间出使大宛，责问楼兰、龟兹王以求解决矛盾，又于返回龟兹时“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④]，诛杀匈奴使者而阻止其继续煽动各国，以壮士之勇，止两国征战。不过，楼兰等国依然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常拦截往来使节，有诏书记载“楼兰王安归常为匈奴间，候庶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⑤]，楼兰亲匈奴而排汉，劫杀汉使、袭击汉军，甚至对诸国来往于汉的使者也进行劫掠杀害，其危害相当恶劣。本传提到傅介子对霍光言：“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他提议先刺杀较弱龟兹王以示惩戒，示威于西域诸国，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3172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2702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01页。
⑤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02页。

让其不敢再对汉不利，而霍光以龟兹路途遥远为由令其先试之于楼兰，最后傅介子与壮士二人用计行刺杀事，斩楼兰王而归，楼兰更名鄯善，国内统治势力都被换成亲汉一派，彻底成为了亲汉的国家。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兼以改易其王，遣使通婚，以较小的成本（而非大规模战争）成功化解了两国冲突，并成功起到了震慑其它西域国家的作用，显示出汉王朝志在西域的实力与决心。继楼兰之后，汉朝攻破姑师并且屯田于伊循，西域东大门为汉所牢牢控制，汉长城更向西延至玉门关。

东汉时，班超前往西域联络各国亲附汉王朝，亦未携带军队，而仅带领随从“吏士三十六人”。在降鄯善的过程中，鄯善王因匈奴使者的到来而对汉使团态度前后不一，于是班超率领三十余人用计纵火杀匈奴使节，“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①]，并将匈奴使节的首级示威于鄯善王，使得鄯善“一国震怖”，不敢再怠慢轻懈汉使，由摇摆不定的态度而不得不亲附于汉，并遣子质汉。而后继续率使团平定于阗，于阗本亲匈奴，于阗王听信巫师，无礼地要求杀掉班超之马，班超在巫师取马之际，再行斩杀之事，交巫师的首级给于阗王以示威慑，再加上班超之前斩杀匈奴使者威名在外，于阗王随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投降了汉王朝。继鄯善、于阗之后，班超欲平定疏勒，班超一行人先劝降疏勒王，未果，班超的部下田虑便抓疏勒王——“遂前劫缚兜题”，并改立其王，解除了龟兹（亲匈奴）对疏勒的奴役，疏勒降汉。前所列举班超事迹，皆非汉王朝大规模出兵西域，而是班超一行人凭借其智计谋略，清除各国排汉、亲匈奴派别，排除了个别对汉存在威胁的因素，树立起汉王朝在西域的威信以致诸国惧服，有利于汉王朝顺利经营西域。相较战争而言，中央王朝以武力威胁西域的方式其成本和代价要小得多，一般只惩祸首，不多杀略，而其成功的关键因素离不开核心人物（如傅介子、班超等人）在其中的发挥的主导作用，非有智谋与胆量不可为之；再之，单凭威胁也无法长久立威西域，其能够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是汉王朝在战争中所展示的军事实力。

2.2.2 战争

西汉一朝，真正对西域用兵的次数并不多，武帝朝，元封三年有伐楼兰姑师之战，太初年间有伐大宛之战；宣帝朝，本始四年伐龟兹，元康元年伐莎车；平帝朝，元始中出乌孙杀卑爰疐。[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窦固等击降车师前后王；章帝建初元年，段彭等破车师；和帝永元六年，班超讨焉耆、危须、尉犁和山国，九年，王林斩车师王涿鞮；安帝元初六年，索班屯伊吾招降鄯善和车师前王，延光四年，班勇斩车师后王军就；顺帝永建元年，班勇斩东且弥王，二年，张朗击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第1573页。
② 参见余太山《西汉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降焉耆；灵帝熹平四年，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发兵辅立且弥王。以上，均是征伐西域成功之例，起到了宣扬国威，排除异己，扶植亲汉势力的作用。

这些战争，可大致分为几种类型：

上节所提到楼兰、姑师地处敦煌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却勾结匈奴，攻劫汉使，传递情报，严重妨碍汉在西域经营。中央王朝为了夺取该交通要道，武帝元封三年，派赵破奴发动了击姑师、楼兰之战，“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①]赵破奴率领属国骑[②]和郡兵数万人进攻姑师，又有王恢等率轻骑兵七百出击楼兰，结果俘虏楼兰王，攻破姑师。并且这一示威性的战争也成功起到了威慑诸国的作用，所谓“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有了楼兰、姑师前车之鉴，各国不敢轻易造次，并且汉所展示的军事实力让各国更加了解汉王朝，从而鼓舞了诸国投靠汉王朝背叛匈奴的勇气，乌孙等国主动遣使与汉交往与此不无关联。平定两国使敦煌以西得以保障，汉在此基础上列亭障至玉门关，汉得以继续推进其向西域的经营。可见，此时的汉王朝并没有因为西域绝远而对各国听之任之，相反，当出现对汉经营西域不利、于汉国威有损的因素时，其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更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特点的战争是武帝时伐大宛之战。

大宛在西域深处，帕米尔高原以外，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距汉十分遥远，故而对汉王朝不甚了解，更加亲近匈奴，在对待使者方面与汉颇有不快，而后发生的求汗血马失败的事件更是直接激化了矛盾。太初元年，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③]大举出征伐宛，就人数规模来看，更甚于击姑师、楼兰之战。而这次出兵并不顺利，一是路途险远，姑师、楼兰在西域之东，是东西方门户要道，靠近汉王朝，大宛却在西域之西，欲到大宛，要穿过盐泽等一系列沙丘荒凉之地，汉军不熟悉地形，难以补给；二是匈奴趁机策动西域诸国，不为汉军供给甚至攻击疲惫的汉军，尤其时行至郁成时汉军被郁成国攻击，伤亡惨重，李广利不得不做出返回的决定。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退至敦煌时，士兵只剩下十分之一、二，足可见其伤亡惨重。在李广利遣使上书请罢兵，朝臣“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的建议下，武帝仍坚持伐宛的策略，“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④]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一行以更强大的规模再次征讨大宛，此次则颇为顺利，有第一次的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6页。
② 属国，颜师古注：“属国，谓诸外国属汉也。”属国骑即附属于汉朝的少数民族所组成的骑兵。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④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页。

经验教训，再加以大军压境，沿途诸国不敢对汉军不敬，甚至争相奉送酒食。最终汉军得到大宛良马，与大宛结盟而还。伐大宛之战，无论是时间还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都更甚从前，早在伐宛之初，便值国内自然灾害，关东爆发蝗灾，甚至蔓延到了敦煌；而伐宛过程的不顺利，国内朝堂上对此意见不统一，西域诸国在匈奴的挑拨下拒汉军于城外，这场出兵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武帝坚持讨伐大宛，不惜“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①]从这段材料来看，伐宛之战的投入远大于其所得利益，汉武帝何故坚持战争呢？史书也已给出明确回答：“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②]此时伐大宛之战不再是以取得大宛马为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大宛不平，亦不足矣平定其它西域国家，因此汉武帝欲借此一战再次用武力震慑诸国，增强其对西域的影响力，以抵御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渗透。《盐铁论》对此有一段评论：

> 初，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先帝绝奇听，行武威，还袭宛，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墝埆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③]

尽管伐宛之战消耗了大量成本，且与所得回报不平衡，但统治者始终坚持积极主动的西域政策，克服阻力，锐意解决匈奴势力影响下的诸多矛盾，显示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决心。伐宛之战的胜利对于汉王朝削弱匈奴势力，进一步控制西域有着重要作用，诸国皆闻汉之威名，在汉匈之间重新做出选择，所谓“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④]而汉王朝亦将自己的亭障范围向西推进到了盐泽。

其二，汉匈之间在西域开展争夺战，汉多联合或指挥西域诸国形成合击。西汉时比较典型的是汉匈之间五争车师。随着汉的势力在西域迅速发展，匈奴逐渐把重点放在车师，以图阻绝汉朝势力。“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⑤]匈奴本在焉耆、危须、尉黎之间设僮仆都尉，北接车师前后庭，南则延伸到南疆，有利于阻止汉王朝势力进入西域。是故汉王朝若能取得车师，其对于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十分明显。天汉二年（前 99），李广利、李陵等出酒泉和居延等路北击匈奴，又“以匈奴降者介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17-3018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 2699 页。
③ （西汉）桓宽著《盐铁论》卷 8《西域》，中华书局 1991 年出版，第 215-216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 2703 页。
⑤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2 页。

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①]联合楼兰国兵另出奇兵第一次攻车师；征和四年（前 89），李广利、商丘、莽通等再次北击匈奴，莽通率四万骑出酒泉，过道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兵别击车师”，此次汉联合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合为车师，使得车师降汉；宣帝本始二年（前 72），“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出塞各二千余里击匈奴以响应乌孙的求援，常惠则带领乌孙骑兵五万，共二十余万大军东西夹击匈奴，“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②]最终使得屯驻车师的匈奴遁走，而战争成果也颇为丰富，“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③]，匈奴人员和畜产等损失惨重；面对车师之地的反复，地节二年（前 68），汉遣郑吉屯田积谷于此备战车师，秋收之后郑吉等“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与周边西域诸国联合，攻下交河城，此后，直至元康四年（前 62），汉匈之间反复争夺车师，这些大小战争，离不开西域诸国出兵协助，如鄯善、焉耆所设“击车师君”，鄯善龟兹设“击车师都尉”各一人，即在职官上与之呼应。日逐王降汉后“断匈奴右臂”，匈奴不得不放弃西域，汉设西域都护并开府，完全确立在西域的统治。

东汉朝，班超在收服鄯善、于阗、疏勒时并未使用战争这一手段便平定西域，恢复了中断六十余年的中西交往。但北匈奴势力很快卷土重来，汉王朝的败退甚至一度想要再次放弃西域，章帝建初元年（76），耿秉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联合鄯善等国兵士营救出被围困柳中城的耿恭，此战之后，章帝诏罢都护，召回班超。此后，班超并未归汉，而是留在西域，以疏勒为据点，联合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家，逐步清除匈奴势力对西域的威胁，所谓“以夷狄攻夷狄”。

其三，西域小国在匈奴的煽动策划下攻袭汉军，如前所述郁成国攻击李广利军，便是如此。汉武帝伐宛之战前，“匈奴……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④]危须、大宛等国亲附匈奴，听从其号令与汉王朝对抗。东汉和帝死后，西域叛汉，安帝永初元年，西域诸国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国家无力解决，只好诏罢都护，北匈奴趁机收复西域国家共同对抗汉王朝，其率领车师后部王攻陷长史索班屯田之所，降汉的车师前王也被击退，而当时执政的邓太后却拒绝曹宗请出兵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的请求，回避西域问题。明帝永平年间，北匈奴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⑤]以致汉朝边郡城门昼闭。又有明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2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第 3785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3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 2703 页。
⑤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帝新丧时，关宠被匈奴围困柳中城直至陷落，而焉耆、龟兹趁机攻杀都护陈睦和副校尉郭恂，杀汉军二千余人，车师王亦在此时受匈奴挑唆叛变与两国围困耿恭的事件。西域小国大多亲汉，即使是亲匈奴一方也不敢在武力上轻易挑战汉朝大邦，多是滋扰使绊，不让汉在西域的活动顺利进行，而起敢于出兵正面对抗汉王朝的情形，多为匈奴唆使挑拨亲匈奴国家响应汉匈之间的争夺战争，或是汉朝在西域势力黯弱之时，已无暇报复这些西域国家。到东汉永兴年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反叛，而中央王朝无力平叛车师，东汉在西域的经营渐趋瓦解。

汉军对西域历次征伐，虽然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征伐对象多有相同之处：即攻击（或杀害）汉使、汉官吏甚至是汉扶植政权的西域国家。它们的行为，于汉朝国威有损，于经营西域不利，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既有的武力威胁方式已难以发挥作用，汉王朝必要用战争来解决这些问题。汉王朝通过对西域地区发动战争，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逐渐驱逐匈奴势力、反汉势力，从而扩大了自身在西域地区的影响，起到了宣扬国威，震慑诸国的作用，通过战争的胜利，汉王朝不断拉拢西域国家，培植亲汉的政权，以推进其在西域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战争的余威，也是两汉经营西域能够顺利进行的坚实保障，李广利伐宛后，“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①]，原本处于观望的小国顺势倒向汉王朝，态度发生截然变化，不可不谓是战争之作用。不过，武力威胁和战争外交手段运用不得宜也会起到反作用，反倒疏远汉王朝和西域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桓帝元嘉二年长史王敬斩于阗王建，于阗大乱而中原却不能出兵平定，便是这一外交运用的失败。

2.2.3 屯田

汉文帝时，为了阻止匈奴寇边，文帝听取晁错之计“募民徙塞下”，开始徙民充实边防。张骞开凿西域后，汉在边关置酒泉郡，又徙民充实之，与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共同构成汉朝西陲的屏障。汉王朝经营西域，需要驻军、遣使者官吏等措施配合，为了给养边防军，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在汉疆域西陲大规模屯田，称之为边防屯田。

轮台和渠犁屯田　这是西汉朝在西域最早屯田的地区，始于武帝太初末、天汉初。轮台，即《史记》中所记“仑头”：“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②]仑头国于太初中为贰师将军所灭（在今新疆轮台县附近），盐泽即今罗布泊，是往来西域中原路途中最艰苦的地段。此时，汉之亭障出玉门、阳关以西而到达盐水，武帝即派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 2703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9 页。《汉书・西域传》则记“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

遣田卒在此处屯田积谷，其规模并不大，仅“田卒数百人”而已，目的是为出使的汉朝使者提供粮食而并非屯戍。征和四年（前 89），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故轮台以东屯田奏》：

> 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①

奏文提议将轮台屯田扩大到其东方的渠犁（即今新疆库尔勒至尉犁地区间），因为此处气候条件优越，适宜耕作，然而这份奏文被武帝否定，到昭帝时才采用桑弘羊所议屯田渠犁，元凤三年（前 78），“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②不过，赖丹很快被杀害，故屯田搁浅。宣帝地节二年，为配合汉匈车师争夺战，令郑吉屯田渠犁，恢复了屯田：“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③并且，屯田规模也扩大为一千五百人，这些田卒在西域从事屯田，战时又成为汉在西域与匈奴角逐的重要军事力量，故渠犁屯田也是汉王朝势力在西域的一个重要军事、经济据点。

伊循屯田　伊循屯田始自汉昭帝时，是对前轮台屯田和渠犁屯田规模的扩大，伊循，地处西域南道的东端，位于今婼羌县密远废墟。昭帝元凤四年（前 77）傅介子刺楼兰王后更立尉屠耆为新任楼兰，并将国名更为鄯善，王向天子请旨在此处屯田以拱卫新生的亲汉鄯善政权：“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④元凤四年底或五年初，汉先遣司马和“吏士四十人”于伊循屯田，后又置都尉主事。关于伊循都尉及其属吏，罗布淖尔汉简中记载：“伊循都尉左（缺）”、“伊循卒史黄广宗二口（缺）”⑤，伊循都尉秩比二千石，卒史为都尉援史，秩有百石、二百石之别。随着伊循田官由司马升为都尉，屯田卒或由四十人扩大至百人，可惜两简文均残缺，不得其详依，而伊循屯田之设毋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12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16 页。对这段文字的解读，刘光华先生在《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一书中认为“将军屯轮台”应是“渠犁”之误，正确的文字应是“将军田渠犁，渠犁与轮台地皆相连也”。因此，《汉书·郑吉传》中“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一说，并非指武帝朝事，而是指昭帝时“初置校尉，屯田渠犁”。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2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8 页。

⑤ 转引自黄文弼编《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第 319 页。

庸置疑。

车师屯田　《史记》中记载为“姑师”，位于今新疆东部天山南北，既是匈奴由蒙古高原进入西域的交通要道，南向则占据天山以南之西域，又是汉朝西域北道的必经之地，故汉匈在此展开激烈争夺，有“五争车师”之说。汉昭帝时，匈奴首先屯田于此[①]，本始三年（前 71），汉与乌孙联军击退匈奴，使得“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汉匈之间几经争夺，终在宣帝地节三年（前 67）降服车师，为了完成统一西域的大业，汉王朝在车师前部屯田，令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②]，成为汉王朝在车师屯田的开端。元康二年（前 64），匈奴再次攻击汉在车师的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保车师城中。”[③]汉不敌匈奴对此处的争夺，故宣帝同意了郑吉上书，罢车师屯田，派兵救郑吉等归渠犁。至元帝时，“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屯田于车师前王庭，重开交河城附近的屯田。关于其在交河城附近的屯田点，罗布淖尔汉简载：“交河壁（缺）”、“（缺）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④]，简文中还见“后曲侯”、“左曲侯”之职，为部、校尉所辖，交河曲仓应是戊己校尉属官交河曲侯屯田储粮之处。加之平帝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系车师后王姑句于高昌壁，高昌壁附近或有汉之屯田，因此，车师屯田的范围，西起交河壁，冬至高昌壁，而其田卒散布于其间绿洲上。

北胥鞬屯田　破车师后，郑吉因并护南北两道顾称西域都护，匈奴退出西域，汉徙轮台、渠犁一部分屯田于北胥鞬：“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⑤]

赤谷城屯田　赤谷城是乌孙大昆弥国都，乌孙分裂为大小昆弥后，小昆弥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与大昆弥元贵靡在人民地界上存在分歧，为了解决乌孙的内部矛盾，宣帝甘露年间常惠再次出使乌孙，“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⑥]汉制一校所部兵在千人以上[⑦]，常惠所将三校屯田士卒，规模较大，似更多作用于分乌孙人民地界，用武力震慑小昆弥势力，《汉书》记载：

>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⑧]

---

① 见于《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常惠传》，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故可知匈奴先在车师屯田。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2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3 页。

④ 转引自刘光华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80 页。

⑤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4 页。

⑥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7 页。

⑦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9《赵充国辛庆忌传》载“步兵九校，吏士万人”推测，一校所部兵在千人以上，三校或有三千人以上。

⑧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9《赵充国辛庆忌传》，第 2996 页。

此处可以印证赤谷城屯田之功能更重“陷陈却敌”，即其作战功能。[①]

新莽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恶化，屯田遂止。到了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和西域关系未能同前代一样维持基本稳定，而是随着朝代更迭或政策改变呈现波动变化，其屯田范围先后在伊吾卢、车师前部的柳中和高昌壁、车师后部的金满和且固城、楼兰以及南疆一些地区进行。从规模、时间、作用等方面来说，东汉在西域屯田不如西汉，但是，东汉的西域屯田政策在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中曾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伊吾卢屯田 伊吾卢位于新疆最东端，北面与蒙古国接壤，哈密古称“昆莫”，汉称“伊吾卢”。此处“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相邻柳中，皆“膏腴之地”，屯田积谷对汉军进驻西域和反击匈奴都有着重要影响。明帝永平十六年（73），东汉北击匈奴，西域复通，于是在伊吾卢恢复屯田：“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②]第二年冬，东汉攻破车师，“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③]东汉分置戊、己校尉，管理金蒲城和柳中城两处屯田，直接隶属戊己校尉的屯区由西汉时的车师前王庭扩大到了车师后部金蒲城，因此西汉北胥鞬的屯田亦并于戊己校尉管辖。此后，随着匈奴以及中央王朝对西域政策的变化，屯田政策时置时废，但是戊己校尉的治所始终在“伊吾——车师（交河城）——高昌壁”一线变动，扼住此“西域门户”之地。西域“二绝”之后，东汉再次大规模屯田在和帝永元中，迎来对西域的“二通”。此时，汉于匈奴有窦宪大捷，取得伊吾卢地，于西域则有班超经营十余年的显著成果。永元三年（91），汉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④]，恢复了车师的屯田。永元四年，“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⑤]伊吾屯田亦恢复。此次屯田时间持续了十六、七年，直到安帝永初元年（107）再次放弃西域，令西域官员内撤，“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憧、禧、博及伊吾庐、柳中屯田吏士”[⑥]，所谓“三绝”。顺帝永建六年（131），东汉第三次恢复西域屯田，“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成为“三通”。

楼兰屯田 汉明帝末年，还恢复了楼兰屯田。建初元年，校书郎杨终上书明帝言“……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

---

① 参见牟雪松《汉代西北屯田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19《耿弇列传》，第 720 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0 页。
⑤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第 2954 页。
⑥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92 页。

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①]此处比《汉书》中所记屯田处多出楼兰，《水经注》中亦记载：

> 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侵沃野，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②]

据考古发现，东汉的楼兰屯田区当在今楼兰城遗址附近。经索劢断河截水后，此处成为了“灌侵沃野”的良田，为汉朝在西域的军事争夺创造了良好条件。

且固城屯田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平西域三策，中计“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为安帝采纳，用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班勇以柳中屯田为据点，为平定车师、焉耆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后更是十七国服从，稳定了西域局势。延光四年，班勇战车师后部王军就，或在此之后，东汉开始了且固城屯田，所以后来有车后部王阿罗多反叛时“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③]

建初三年，尽管此时中央王朝已经罢伊吾屯田，实际放弃了经营西域，但班超仍在西域诸国活动，他上疏章帝请求增兵，言“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④]章帝以徐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据此推测徐干所领兵卒或与屯田有关，班超等在西域经营着小范围的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

屯田区域的选择，西汉在伊循、车师前后国、渠犁、轮台，东汉亦有伊吾、楼兰，它们多位于当道要冲，一方面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如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在此处屯田积谷颇有收成；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上是贯通东西的交通要道，“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楼兰也是“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的要冲。不难看出，两汉屯田所选址都具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既能在后方提供物质支持，又能在战略上获得对抗匈奴、夺取控制西域的主动权，向西域诸国表明了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决心，并对诸国起到震慑的作用。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8《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1597页。
② 《水经注校正》卷2《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第37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下《西域传下》，第2930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第1576页。

2.3 经济方面

“丝绸之路”发端于西汉时期，这条商贸之路承载着东西方商品的交换，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交流有力促进了双方物产的流动，丰富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同时，伴随商品、物产的交换，生产技艺领域亦产生了东西互动。

2.3.1 农牧业

纵观两汉时期同西域的交往，前后不下三百余年，期间维持正常关系的约有二百余年，宣帝神爵二年（前 60）至西汉末，东汉明帝末至和帝末，这两个时间段中央王朝实现了对西域的绝对控制，双方往来畅通无阻约有百年。至于民间的往来，则更甚于以上数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交往关系中，除了政治关系以外，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亦有互动，表现为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相互影响。元狩四年（前 119），张骞携带更大规模的出使队伍第二次前往西域，此行之后，西域各国与汉朝加强了贸易往来，为中原汉朝引入了大量西域特产，如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同时，将汉朝的先进文明和技术传到了西域。汉代西域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以北准格尔盆地的边缘，利用从高地上融化的水在绿洲上生活，大多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还有高原气候和高山气候。地理环境的差异孕育了不同形态的农业文明，西域诸国的经济按自然条件可分为游牧和绿洲两大类，与中原地区农耕文明主导下的物产截然不同。西域作物传入中国，对于丰富两汉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①]

上引史料所提到的蒲陶（即葡萄）、苜蓿皆由张骞出使西域后才传入中国内地，并为广泛种植。葡萄，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西域传》中记载且末、龟兹、焉耆、难兜、大宛、康居等地都盛产葡萄，大宛人饮葡萄酒蔚然成风，既是其社会风气，也变相说明大宛葡萄产量丰富以及酿葡萄酒技艺的成熟。随着葡萄的种植范围扩大，葡萄酒酿造技术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随之发展起来。汉哀帝元寿二年（前 1）单于来朝，“舍于上林苑蒲陶宫”，[②]皇家林园的苑囿以葡萄为名，窃以为这是葡萄文化东传的一种表现。东汉灵帝时，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3-3174 页。

② 参见（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4 下《匈奴列传下》，第 3817 页。

还有用葡萄酒行贿一事，当时扶风人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张）让”[①]，张让大喜，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按汉制，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所谓“五量”，因此一斗酒数量并不算多，与此同时，向张让行贿的人皆是“以珍玩赂之”，而最终孟佗的一斗葡萄酒却得到了张让的青睐，不可不谓东汉时葡萄酒的珍贵程度，此时中原地区还未完全普及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上层社会享用尚且不是易事，在民间百姓恐更难一见。苜蓿，产于大宛，是大宛马的良好饲料。武帝数征大宛，终于得到大宛良马，即“天马”，为了解决其饲料问题，遂在中土大量移植苜蓿，被称为“光风草”。

除此之外，传入内地的西域作物还有石榴、红蓝花、酒杯藤、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萝卜等。[②]

石榴　盛产于西域安息、大夏、大宛等国，自张骞通西域才东传，《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③]陆机（晋）《与弟云书》也提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途林安石榴也。”

酒杯藤　崔豹《古今注》：“酒杯藤出西城。藤大如臂，去实，皆可以酌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实消酒。其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国。张骞大宛国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④]

胡麻　《续汉书》：“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⑤]而胡饼的做法需要放胡麻为佳。可见，东汉时，芝麻已经在京师流行起来。

胡豆　《本草经》：“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豆，或曰戎菽。”[⑥]

胡桃　《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武帝时在上林苑种植胡桃，后又在华林园种胡桃八十四株。[⑦]

胡蒜　崔豹《古今注》：“胡国有蒜，十子共为一株，二箨裹之，名为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谓之大蒜。”[⑧]又《东观汉记》载李恂为兖州刺史，“前柑史所种园小麦、胡蒜，悉付从事，无所留”，谢承《后汉书》载费遂为扬州刺史，“悉出前柑史所种小麦、胡蒜付从事”，[⑨]兖州、扬州等地胡蒜同小麦一起种植，俨然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第2534页。

② 黄盛璋、钮仲勋著《从历史地理看西北边疆》，《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出版。

③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970《果部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773页。

④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995《百卉部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973页。

⑤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860《饮食部十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930页。

⑥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841《百谷部五》，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29页。

⑦ 参见刘永连《浅探西域文化在唐人园林、庭院中的流痕》，《唐史论丛》2009年第1期。

⑧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977《菜茹部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27页。

⑨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977《菜茹部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26页。

了内地的一种平常作物。

西域作物传入中国的同时，两汉的农耕文明亦影响着西域。在新疆尼雅遗址展示的果园遗迹显示，除了葡萄种植外，还出现了桃树、杏树、桑树等中国原产作物。

桃、杏 桃树、杏树，皆是中国内地最早培育的果树。《诗经·魏风》中就有“园有桃，其实之淆”的句子，表明当时黄河以北以及山西广大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工栽培桃树的记录；其他古籍如《管子》《尚书》《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亦有关于桃树的记载，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民便在黄河流域种植桃树。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公元前二世纪后，中国的桃树经由中亚向西传播到波斯，并引种到希腊、罗马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尼雅遗迹随处可见桃核、杏核，便是这两种果树西传的有力证据。

桑 原产中国中部和北部，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饲料，而蚕丝是极佳的纺织原料，故桑树是中原地区最典型的经济作物，通过尼雅遗迹的桑树残存，也可说明桑树种植的西传。

两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是传播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重要一环，对西域农业生产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前文已提到，两汉时期，汉王朝在轮台、渠犁、楼兰、车师等地多次屯田，屯田卒将中央王朝的耕作模式移植到了西域的屯田区，而西域干旱，屯田必须兴修水利，故而中原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得以传入西域。《水经注》中载敦煌人索劢在楼兰屯田时，“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索劢率人横断注滨河，掘渠分水，不仅使楼兰的缺水困境得到缓解，还使许多贫瘠的地方成为沃土，三年便得“积粟百万”。关于西域水利灌溉工程，考古遗迹可以证实，各屯田遗址内渠道至今仍可见。如库车西南沙雅县境内的一条渠道长 100 多公里，宽 8 米，深 2 米，两旁有汉代城垒和农田遗址，并出土了汉五铢钱，至今仍被称为“汉人渠”[①]。楼兰古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汉代灌溉系统沿河道修有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有的支渠长达 2 公里。这些都是两汉时期汉族人民同西域地区各族人民合作的见证，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灌溉技术传播到西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域的人地环境，提高了生产力。除了灌溉技术，内地人还将凿井技术传入西域，李广利伐大宛时，

>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②]

在此之前，大宛国尚未掌握凿井技术，而是西汉时由汉人所传播，学会凿井

---

① 参见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6 页。

技术则是运用井渠灌溉的前提。西域不同于中原的自然气候条件，沙漠遍布，其水源大多依靠高山融雪，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地下水难以被利用，中原凿井和井渠灌溉技术的传入，有利于开发对地下水的利用效率，解决农耕文明区域[①]的灌溉难题，因而促进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②]在东亚诸国，我们难以产生弗兰德斯和意大利那种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因此更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这一措施符合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农业灌溉技术的传播不仅影响着西域，甚至对中亚、西亚地区的农业生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凿井技术西传，亦可能和今新疆地区独具特色的坎儿井灌溉系统存在着十分之关联，或认为在汉代便已传入敦煌及其以西。[③]

畜牧业方面，西域游牧民族饲养马、牛、羊、驴、骆驼等动物，其输往内地最多的便是马。

马匹　西域许多国家都盛产马匹，如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天山以北有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塔里木盆地周围有鄯善"有驴马，多橐它"，葱岭以西有罽弋"出名马"，蒲类"国出好马"，昆仑山北麓乌秅国则"出小步马"。这些马中尤以大宛汗血马最佳，在此之前，汉得乌孙马并命名其为"天马"，而知道大宛马之后便将乌孙马改称"西极"，而称大宛马为"天马"。武帝想要将大宛马引进内地，先是派遣使团用珍贵的"金马"与大宛国交换马种，却遭到拒绝，之后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攻下大宛城，用武力得获"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并且和汉王朝约定每年"献天马二匹"，终于将大宛马引入内地，《史记》称其为"天马内向"，为了解决大量天马的饲料问题，汉亦将苜蓿在中国广泛种植。马种引进的方式，除了上述使用的武力途径获得战利品，也有交换、赠送所得，如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西域诸国向汉王朝纳聘或以示交好时，贡献的马匹不在少数。西域优良马种的引进，改善了汉王朝的马匹品种，对于提升骑兵的战斗力从而在与少数民族交战中展现优势有着重要意义。

骆驼　背上有驼峰形似囊橐，可作为役畜以供驮运和骑乘，《西域传》载为"橐驼"、"橐它"，是除马匹外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家畜。西汉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是没有骆驼的，甚至直到东汉时岭南一带还有人没见过骆驼，故当时有谚语

① 除了两汉在西域的屯田区域，西域诸绿洲国家本身便有以农耕文明为主者，如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渠犁、危须、焉耆、单桓、车师前国等。

② 参见尹华广《法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阐释》，《理论月刊》2011年第9期。

③ 参见安作璋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出版；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以为马肿背”。而在西域地区通行往来，橐驼却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宽大的脚掌适合在沙漠中行走，巨大的驼峰则能在缺水缺食的沙漠环境中储存和提供能量，素有“沙漠之舟”之称。西域各国亦较为广泛的饲养骆驼，鄯善“有驴马，多橐它”，大月氏国“出一封橐驼”，《后汉书》载蒲类国“有牛、马、骆驼、羊畜”，东离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时，规模更甚之前，称“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①]不仅使者、商人通行于西域需要用到橐驼，汉王朝对西域的征讨过程中，也使用了大量骆驼驮运物品。

2.3.2 工商业

汉王朝对西域经济上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技艺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的传播，这是先进文化向落后地区传播使然。屯田和兴修水利都需要金属工具，但在武帝以前，西域地区冶金手工业发展落后，“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②]冶铁技术本来就是由汉人发明并且逐步西传的，大宛以西诸国地理位置上远离汉王朝，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不懂冶铁完全有可能，这些国家的铸铁技术的发展，得益于汉使者和士卒将中国的金属冶炼西传，而铸铁技术的提高也有利于改进诸国制铁兵器的使用。轮台、渠犁等地在西域东端，桑弘羊曾上书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③]如桑氏所言，轮台、渠犁等地地理环境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尚且缺少铁器等金属工具，可想而知其它国家则更难获得。陈汤也曾指出：“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④]陈汤所言胡兵即指西域等少数民族士卒，他们金属冶炼锻造技术不如汉王朝发达，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所谓汉巧，是指汉王朝相对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这些技术的西传，促进了西域地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西域国家从汉人身上学来先进的冶铁技术并运用到兵器的生产中，从而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到宣、元时期，婼羌、鄯善、莎车、姑墨、龟兹、山国等都有了自己的冶铁铸造业，能制造各种兵器：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后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能作兵，与婼羌同”，难兜国“作兵与诸国同”[⑤]，其铸冶技术无疑会受到中原先进技术的影响而获得提高。这种变化在考古遗迹的发现中可得到证实：罗布淖尔早期墓葬的时间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列传》，第 2700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6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12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23 页。
⑤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84 页。

属于汉武帝以前，其中仅出土少数铜管和铜环；而在其晚期墓葬和居住遗址中，则发现了诸如铁刀、铁簇等许多金属制品，并且这些箭簇的样式多作三棱式和双翼式，与中国内地箭簇常见形式一致，不难推测其冶铸技术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尤其是东汉以后。

中国丝和丝织品的西传，是两汉王朝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对西域的又一重要影响。中国自古工艺发达，绢丝织物、漆器、玉器、陶器等工艺品历来受到西方国家喜爱，两汉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东方的商品更加便捷地运输到西方，尤其是丝织品，据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 27-79）的记载，当时中国输往罗马的商品便是以丝、铁为最。《后汉书》提到伊吾卢地宜种植桑麻，一般认为麻指亚麻，正符合地中海地区以亚麻为主要织物的习俗，而古代西域本没有丝，《史记》记大宛国“其地皆无丝漆”，西域的丝便是由中国内地西传而来。在西域人的眼中，东方的丝是很神秘的东西，丝是桑蚕吐丝而成，与他们使用植物纤维纺织的习俗完全不同，所谓“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①]，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还认为中国的丝是在树上生长的，而丝的纺织方法则是先将其用水打湿，再加以梳拢整理，再制成丝织品，显然其观点是对中国丝和丝织品的一知半解。因为丝既神秘又美丽，各国对丝织品十分喜爱，再加上运输成本的艰难，丝的价值相当贵重，例如中国的丝运到罗马时，能和黄金等价，只有少数贵族才能穿着并作为炫耀，凯撒皇帝就曾穿着绸袍看戏，可见罗马人对东方丝绸的喜爱。在这条逾 7000 公里的“丝绸之路”上，来自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起发挥着连通着中西交往纽带的作用，成为当时东亚文明繁盛的折射。高额的回报吸引着东西方商人将丝绸由东方运往西方，故商贸传播是丝织品向西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一个传播丝织品的重要途径则是赏赐和朝贡贸易。武帝时，安息、驩潜、大益，姑师、扜罙、苏薤等小国遣使来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②]武帝把丝织品作为一种贵重的礼物赏给诸国使者，既向其炫耀汉之富裕强盛，又可以此厚礼笼络各国人心。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绛宾来朝，得赏赐“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③]，不可谓不丰厚，当时的龟兹积极学习汉文化，着汉衣，学汉仪，建汉宫，数来朝拜，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除了帝王的直接赏赐，汉使代为赏赐西域诸国的情况要更为普遍，通过赏赐的方式，实质上是在向西域地区输出汉王朝的物质文明，借以扩大中央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有力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汉武帝给了他大量财物赏赐诸国笼络人心，这其中就

① （北齐）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 1996 年出版，第 379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3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16 页。

包括了“帛”等丝织品：“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①]元封中，乌孙公主细君为昆莫右夫人，“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这样的赏赐行为有利于增进同乌孙上层人物的关系，改善乌孙公主在乌孙的处境。不过，这些赏赐都是建立在丝织品的高昂价值之上，桑弘羊说道渠犁地“贵黄金采缯”便是说丝织品在其地很受重视，又有李广利初次伐大宛之时，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远汉而亲匈奴，对待匈奴友好而对汉使态度傲慢，“非出币帛不得食……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钱和丝织品被放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可想而知丝织品的价值，并且从这段话还可以看出大宛也在打汉诸如丝织品的“财物”的主意，希望通过贸易的方式得到更大的利益，《后汉书》还记载着安息“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可见丝织品是诸国争相想要交易的商品，而其驱使原因无非是中国丝织品所能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

西域的织物也借由东西方的交往传入中土，尤其是毛皮和毛制品的东来。《后汉书》记载天竺国“有细布、好毾㲪”，氍，氍毹、毾㲪都是毛织品的毯子，《释名》解释毾㲪为“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②]，主要是宫廷里作为地毯或床褥、坐垫使用，毾㲪的毛更加精细，是古代西域氍毹中质地最高的一种有花纹的细毛毯。天竺国俗与大月氏同，而西域中大月氏是毛织物的著名产地。清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班固·与弟超书》中写到班固委托班超换取大月氏的毾㲪，并且嘱咐“月支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这可以反映出汉人尤其是上层阶级对毛织品的需要，并且懂得如何挑选质量上乘的毛织品，显然是基于对其商品特性的了解。《三辅黄图》记温室殿“温室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定以罽宾氍毹”[③]，以罽宾毛毯作为宫殿华美的装饰，既可反应出毛毯本身制作精美，也说明了，尽管西域的毛织皮东传，但它和中国西传的丝织品一样，能有资格使用的还是上层社会人士，普通群众很难享受，事实上，直到明清时期，尚有质量上乘西域毛毯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新莽末年，刘秀和王郎争夺河北时，景丹与耿弇、寇恂、吴汉、王梁、盖延一起率领上谷、渔阳的精锐骑兵前去支援刘秀，至广阿会和，刘秀出城外设酒肉招待景丹等人，即是“下马坐鞍旃毾□上”[④]，可见西域毛毯在汉代当作坐垫的使用功能。西域不少地方畜牧业发达，故而许多国家都有着丰富的毛纺织工艺以及各种布料纺织工艺，两汉书中记录较为单一，引《魏略·西戎传》对大秦国（即罗马）的一段记载：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② 参见魏宇文《丰顺客闽双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嘉应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③ 陈直校正《三辅黄图校正》卷3《未央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53页。
④ 刘珍等编《东观汉记校注上》卷11《景丹传》，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第407页。

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毾㲪、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①

大秦国的纺织体系相当完备：其一布匹种类多，除了毾㲪等毛织品，其织物还有金缕绣（金线交织而成）、金涂布（涂金的布）、火浣布（石棉）等诸多类型的布匹，大秦人用水羊毳和野蚕丝织成细布称“海西布”，并且用中国的丝纺成“胡绫”；其二染色工艺成熟，毛织品和纺织品的色彩丰富；其三有自己独特的纺织工艺，与中原王朝风格迥异。尽管两汉书中只提到了毾㲪等传入中国，但绝不能排除在这个时期西域地区的其它织物传入内地的可能，它们作为商贸、贡品或者战利品向东方传播，一同传入的同样还有西域的纺织技艺和染色技艺。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使东方的丝制品作为一种商品西传，还将穿梭于经纬线中的纺织技术向西传播。20 世纪 30 年代，考古队在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发现了一批精美的汉代丝织品，其中发现的一块“汉式绮组织”织物使用的是汉代最普遍的纺织技术：平纹的地组织上，经线相间隔地织起三上一下的斜纹浮花。②又有一块汉绮织有左右对称的双角兽，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纹绮十分相似。1959 年民丰北边发现的东汉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织花毛织物也可以反映这一点，这些毛织物使用的是在纬线起花的组织法，符合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织法，而上面的纹饰既包含中原地区的传统图案，也包含西方卷发高鼻的人物和葡萄图案，体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来时向汉武帝报告：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③

大夏即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一代，尽管当手机汉王朝和西域地区没有政治上的来往，但中国的工艺品却伴随着商业传到了西方，身毒（即印度）商人充当着东西方商品交换的中间人，将中国的邛竹杖、蜀布运往大夏，不过此时中西之间的闭塞状况很难有大规模的通商活动。至西域南北两道为汉王朝所并，中西之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阶段，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才得以打通，汉人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新疆，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地跨东亚、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地中海沿岸，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

① （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卷 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 860-861 页。
② 屠恒贤《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纺织技术交流》，《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6 页。

之路正式形成，在这条交通大动脉上，中西方的商品发生着更大规模的交换。

武帝时，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从而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中国的商人、使者经过河西走廊，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两道，出此两道可到达塔里木盆地。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北道之北另开一道，由伊吾卢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让北疆也融入丝绸之路。走得更远的商人则越过了葱岭，来到南亚、中亚和西亚，足迹遍布西域。章帝章和元年，班超的副使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显示其活动范围已到达欧亚交界的里海附近了。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与西域的通行贸易，两汉时期还开辟了海上交通由南洋群岛进入印度，并且随着东汉势力在西南的进一步扩张，滇缅都被打通，印度也顺势在中西贸易中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①]

从这段话中反馈出几个信息：许多汉使出使西域有着经济上的目的，他们侵吞出使所携带布帛财物，把官府送给西域各国的礼物占为己有再低价卖给外国，以谋取私利，因此这些使者实际上也是具备了商人的属性的。至于使者的数量以及他们所携带的物品，同传又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②]，至于张骞出使时，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可以想象，这些使者或者说商人所携带的物品之丰厚，中国的货品随着他们前进的步伐逐渐西行。

而西域的商人同样沿着这条商路，往来东西方贸易。自大宛至安息，其人皆“善市贾，争分铢”，有着浓厚的经商传统，如大夏“善贾市……有市贩贾诸物”，安息“民商贾用车及船”，高附国“善贾贩，内富于财”，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其利十倍”，其例不胜枚举，中西方贸易的巨大回报更能吸引这些异域商人趋之若鹜，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③]。西域商人来汉，打着贡献的名义而行经商之实，如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罽宾实利赏赐贾市”[④]，反映罽宾所遣使者多为商人；

---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1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0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31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87 页。

成帝时，康居曾遣子质汉、贡献，但自矜绝远，态度傲慢，无礼于汉使者，《汉书》中记载了当时西域都护郭顺对康居遣子的评价："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①]郭顺认为，康居一面遣子向汉朝示好，一面对待汉使者以倨傲，这也是因为康居追求的出使利益不在政治而在于通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遣使来献象牙、犀角、玳瑁，贡献珍奇是为了与汉王朝通商，以改善被安息等国阻断通商的被动地位。[②]

至于双方商品交换的内容，汉王朝的丝、铁以及各种工艺品受到西方的喜爱，牛、羊、马等也是用于交换的商品之一。西域商人一方面将汉的特产运往西方转卖，另一方面则把西域的特产尤其是迎合上层阶级喜爱的奇珍异宝带来中原，在《汉书》中对黄支国记载为：

> 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③]

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绣金的布匹，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消费的，来自西域的特产，似乎也正迎合统治阶级"求奇物"的心态。除了之前所提到的天马、橐驼等，西域各国还有许多异兽被作为贡品送来汉朝，如安息国数次遣使，武帝时"以大鸟卵献于汉"，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尤其是《史记》载武帝时，见到诸国使者来献奇物大悦，于是"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又设酒池肉林宴请西域来时，以彰汉王朝的富庶。特产珍奇更是品类繁多，如大秦国：

>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市。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④]

金银珠宝、宝石珍奇、布匹、香料、器物等都是西域输往中原的重要贡品或者说商品，这些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后，行到一处，便停下来做买卖，所谓"到一处辄止"。东西方商品交换的结果，连接了东西两个世界，东方的丝绸运往到了西方，而汉时的皇家园林上林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⑤]不仅如此，借助商贸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丝绸之路"遂成为古代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2-3893 页。
② 黎虎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第 365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71 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9 页。
⑤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40 上《班固传上》，第 1338 页。

流通道的统称。

2.4 文化方面

在中央王朝和西域的交往进程中，随着交往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地各具特色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并深刻地影响后世。

2.4.1 艺术

文化艺术方面，《西域传》中着墨最多的就是来自西域的杂技娱乐。杂技在中国便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域杂技的传入愈加丰富了中国杂耍的内容。

《史记》载条枝国“善眩”，武帝元封三年事中对安息国有一段记载：

> 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①]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②]

西方的杂技，有眩术、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等等，种类十分丰富，一般将表演者称作眩人、幻人，随着西域通汉，西方眩人、幻人涌入内地表演西方的杂技种类越来越多，除了中国旧有的角抵戏诸杂技，民众可以观看到更多形形色色的杂技表演，所谓“觳抵奇戏岁增变”，经历汉武帝以降对其体系丰富充实，东汉时称“百戏”，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后汉书》又载东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③]黎轩、大秦都指的罗马，可知从西汉起罗马的杂技团便和中国内地有了接触。至于普通民众是否能接触到这些西域文化，我认为是存在可能性的，首先杂技本身是为了娱乐，它以较为通俗的艺术表现形式便于大众接受，在汉代而言，张衡《西京赋》中描写了许多当时表演杂技的情景，而他所观的表演地点大多在广场——“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尽管张衡的作品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行文中许多对杂技的描写是符合史书记载的，从其描绘的诸多杂技类型，西域杂技东传之景可见一斑：如跳丸，汉代随着“跳丸”的普及，逐渐发展为所抛弄弹丸有大小轻重之别，抛接，且手、臂、肘兼用，甚至和利剑

---

① 索隐韦昭云：“变化惑人也。”按：《魏略》云“犁靳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植瓜等也。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3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6《西南夷传》，第 2851 页。

一起抛耍，所谓“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假面戏，“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化妆歌舞，“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斗兽，“熊虎升而拏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磷囷”；幻术，既有前所述罗马的吞刀、吐火等眩术，也有带有印度特色的舞蛇，“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马戏，“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足矣见两汉时期以西域杂技在中原的传播，并且，在汉代石刻画像中再次得到证实，山东嘉祥县汉画像石中就有着弄蛇（见附录图三）、吐火的场景，至于角力、斗兽、骑马等表演，也在汉石刻画像中有所记载。[①]

受西域文化影响下的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民族融合的特点，这在汉代所出土遗迹中能够得到证实。其一，艺术所表现的内容题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现存的东汉武氏祠中石雕画像中出现了许多有翼的人首蛇身像，其间还夹杂许多奇珍异兽的形象，这种题材一看便知不是东方神话传说的形象而更接近西方神话传说。还有如前所述各种西方杂技的场景刻画较广泛地出现于文学作品或者艺术雕刻中，亦和它们本身在中原的传播有关。其二，其艺术的风格可见在中国的传统风格中融入了西方的特点，如之前提到笮融兴修佛寺以及佛像的装点，表明其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并且，在汉代的舞乐艺术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融合。

武帝之前，汉代流行楚歌楚舞，史载，汉高祖刘邦素喜爱“楚舞”，该舞以柔软的腰功而尽显舞蹈之魅力，汉雅乐中，保留有当年刘邦过沛县所作《大风歌》，是为楚歌，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便擅长楚舞，当时乐器仍以钟鼓琴瑟这样的传统乐器为主。汉武帝时，“丝绸之路”也带来了中亚、西亚的乐伎和杂耍艺人，丰富了汉宫传统的百戏体系，新的乐器如箜篌、琵琶、胡笳、胡笛、胡角加入汉乐，新的曲舞“四夷乐”、“胡乐”、“胡舞”风靡于世。此处列举两种西方传来之乐器：

箜篌　又叫“空侯”、“坎侯”，《史记》记武帝令乐人侯调依照瑟仿制箜篌[②]，以祠泰一、后土，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此后，箜篌多用于皇家郊庙。东汉时从西域引进了另一种竖箜篌，“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③]东汉所做《箜篌引》是为乐府《相和六引》之一。

琵琶　出于西域，相传琵琶的诞生还与和亲乌孙公主有关，傅玄《琵琶赋》

---

① 安作璋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 1979 年出版，第 174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孝武本纪》，第 472 页。

③ 董希平《箜篌与宋词演唱》，《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而琵琶由西域传入汉者种类有好几种，再加以汉人的改造，逐渐成为中国之国乐。

随着西域乐器和乐舞的引入，汉代歌舞面貌也焕然一新。汉代乐舞百戏融舞蹈、音乐、武术、杂技、幻术等艺术形式于一体，既直接继承了先秦的传统，又融会了周边及西域各民族的舞蹈艺术，这在汉代石刻画像中亦有所反映，浑然不似古代之风格，显然是收到西域风气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反映出古代民族身体文化的诸形式在汉代的大融合局面，对日后的舞蹈、杂技、武术发展都有着持久的影响。"[①]

2.4.2 宗教

两汉书《西域传》中对西域各国宗教的记载，以佛教最为丰富，除了天竺，西域其它国家如小月氏、大月氏、疏勒国等也都信奉佛教。各史《西域传》中还提到了其它的宗教，如高昌国、波斯国信奉祆教，但这些国家和宗教在两汉时期的史书中几不可见，唯有天竺的佛教记载相对清晰，能够确信的认为佛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从属于东西方外交的一环。

天竺国，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是中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印度商人将中国的商品运至遥远的西方，而印度之佛教传入中土后，又由中国东传至东亚的朝鲜、日本诸国。因此，笔者认为，中央王朝和西域的交往，其实质是一种互动的交换行为，它并非单一的由一方输送往另一方，而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并向世界范围内扩散。

《后汉书》中记载天竺国"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②]，浮图即"浮屠"、"休屠"，皆佛陀之异译，古人称佛教徒为浮屠，佛教为浮屠道，[③]这是比较明确的记载印度信佛的文字。汉武帝时霍去病征讨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五万众降汉，汉得其金人，然而当时武帝等并不知此为何物品，"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④]可见武帝之前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内地，而后张骞出使西域，闻大夏之旁有身毒国，"始闻有浮屠之教"。尽管佛教传入中土的具体时间没有定论，但这个时间能够确定是在汉通西域以后无疑。汉武帝通西域后，东西交通历经百年的发展，无论是商品还是文化，都借由这条道路进行交换，佛教也不例外，到汉哀帝时，"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国闻之，未信了也。"[⑤]此时的佛教可能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

---

① 任艳花《汉代武舞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1 页。
③ 贺金峰《丝路源头河南南阳方城考》，《荆楚学刊》2015 年第 2 期。
④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 114《释老志》，第 2011 页。
⑤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 114《释老志》，第 2011 页。

有所影响，亦表明西汉朝末年佛教在内地传播。东汉时，史料可见佛教正式入华的记载[①]：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

此时统治者已经明确地知道所谓金人便是佛教信仰的佛，并且有组织地遣使往天竺求佛法，将佛教正式引进内地，其中提到了楚王英率先信奉佛教，可为东汉上层阶级信佛的首例，刘英本传中亦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③]

其末尾提到将所交的缣帛退还以帮助沙门近住之僧侣作一次盛馔，从中可以看到，不仅上层阶层信仰佛教，甚至政府也许可及支持佛教活动。桓灵以降，佛教逐渐走向兴盛。桓帝延熹七年，襄楷上书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④]，可见宫廷中之佛教，佛教不仅是上层阶级甚至成为了帝王的宗教信仰。至于佛教传至民间应同在东汉末年，《后汉书》记丹阳人笮融在广陵、下邳、彭城"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⑤]可见佛寺的建筑，佛像的装饰以及佛徒供养之事，一应俱全，信徒人数也不在少数，可知此时佛教或自上而下走入民间了。

佛教的传入，不仅传播了新的宗教信仰，受其影响，中国的建筑、绘画、文学等艺术内容中可窥见外来风格的融入。

2.4.3 其它

在西域交流中，西域诸国向往汉之礼仪文化，向汉朝学习者亦有之。以龟兹王绛宾为例，宣帝朝，绛宾娶解忧公主之女，又曾在汉王朝生活过，无不受到汉文化熏陶影响，故其归国后"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

---

①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第 37-39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2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42《光武十王列传》，第 1428-1429 页。李贤注："伊蒲塞即优婆塞也，中华翻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门即沙门。"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30 下《郎顗襄楷列传下》，第 1082 页。

⑤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73《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 2368 页。

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不难看出，龟兹在服饰、宫室建筑、礼仪等方面都受到了汉王朝的影响。其妻也就是解忧公主之女曾“至京师学鼓琴”，鼓琴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以其乌孙公主的特殊身份，归国后不排除将汉乐在乌孙上层人士中传播的可能。尤其是西域诸国质子侍汉后归国，他们常年生活在汉王朝，学习汉语言文化，这不仅是一条具有政治意味的归国之路，也是一条汉文化的西行之路。语言差异是东西方交往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障碍，首位出使乌孙的细君公主便曾因言语不通而愁悲，到解忧公主出使前却可“舍上林中，学乌孙言”[2]，在国内对其进行培训以减小语言沟通的障碍，其可以反应出汉王朝和西域的交往越来越紧密，彼此了解逐步加强。

两汉在生活习俗方面也受到了通西域的影响。新作物的引入，不仅极大的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有的植物还可以作药物用，丰富了汉代中医药学。《后汉书》言“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西域的服饰、日用品、饮食、音乐可谓一应俱全，并且深受汉灵帝喜爱，尤其是“胡床”的传入，可谓通西域的一大贡献，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4]一般认为东汉末年传入内地，因其具有携带方便、使用舒适等特点，传入中原后逐渐改变了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改“跪”为“坐”。考古发掘显示，在罗布淖尔、尼亚两地遗址中发现的木椅，成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椅子。[5]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16-3917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05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103《五行志》，第 3272 页。
④ 参见暨远志《胡床杂考——敦煌壁画家具研究之三》，《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4 期。
⑤ 参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 年第 1 期。

第3章 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的动态发展

以上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横向总结归纳了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域外交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章节试对两汉时期这一时间跨度中的对西域外交进行纵向梳理。自武帝建元年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末年中央王朝政权的衰微，历经西汉、新朝、东汉三个朝代三百余年时间，中央王朝与西域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增强，但在交往过程中却是和平与冲突并存，表现为波折的发展趋势。

3.1 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是中央王朝对西域外交的开创阶段，西汉政府建立了一套适应同西域发展阶段的外交体系，至西域都护设置和开府以后逐渐达到全盛阶段。而在西汉王朝后期和王莽执政期间，随着中央政权的混乱和国力的变化，导致中央无力维系以往的对西域政策，遂与西域关系断绝。

3.1.1 探索和发展

这一阶段从武帝时张骞出使大月氏开始，至宣帝时西域都护设立并开府，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外交经历了从无到有，整体上处于一个探索和发展时期，随着双方接触增多，互相之了解亦加深。

西汉初年，匈奴一直是汉王朝边境最大的威胁，即使有“和亲”之策，匈奴仍然不断骚扰我国边界，但迫于其军事实力，汉王朝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至武帝朝，历经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国力恢复，西汉王朝对匈奴关系上亦进入了战略反击阶段。建元年间，汉为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首次出使所到之地包括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因此得以了解这些国家的部分情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出使，更新了汉人眼中对西域的地望构建，从前未闻之疆域和政权新涌入汉人的世界，简单来讲，就是汉人眼中的西域变“大”了，那么与其联合对抗匈奴的可行性因素发生变化，尽管张骞因为“不得要领”没有实现其出使目的，但是西域国家开始受到汉朝统治者的关注。在张骞首次出使后不久，汉王朝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元狩三年（前120）“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①]祁连即天山，是当时匈奴在西域的据点，这是汉军首次进入西域的记载，在对匈作战中，汉军取得了胜利，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8页。

浑邪单于降汉，并出现了“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①]的局面，这为汉朝再次联络西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契机。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以和亲乌孙，此次出使携带了大量财物，并且自信满满地认为乌孙一定能够按汉王朝所设想的那样配合，而汉可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目标。然而适逢乌孙国家分裂，乌孙大臣也不敢轻易同相对陌生的汉王朝合作，“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这次出使的目的再次落空。究其原因，乌孙缺乏对汉王朝的了解，而匈奴在此之前却称霸西域，所以乌孙基于形势做出了较为谨慎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再次说明汉王朝对西域的不甚了解，不熟悉西域的国情，想当然的认为西域诸小国在强盛如汉王朝的利诱下，必定会合作。总的来说，当时汉王朝与西域的外交关系尚在探索和萌芽阶段，很难在此时结成一个牢靠的政治同盟。然而此次出使也正是双方外交在此阶段所跨出的一大步，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等国，探索未知西域世界，通过赐予财物的方式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西域大国的乌孙也遣使来汉，这是西域王朝对汉态度的一次转变，体现其由不合作状态转向有合作可能的趋势，使得乌孙较为直观地了解到汉王朝国力强盛，故而在外交上更加重视汉王朝，所谓“其国乃益重汉”[②]。此后，其它西域国家亦遣使来汉，汉王朝与许多西域国家之前逐渐打破了完全隔离的外交状态，史书称之为“凿空”，是十分形象的。

另一方面，此时汉王朝并非单纯的依靠和平交往之手段，而是以和平为主、武力辅之。面对西域交往进展的不理想以及匈奴的威胁，武帝时几次用兵西域，发动对楼兰、姑师、大宛等国的战争，通过这些战争以及前文所述刺杀等手段，起到了对西域诸国武力威慑的作用，为汉使西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又鼓舞了西域各国向汉王朝亲近，伐大宛后，大宛本在西域西端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不仅葱岭以东许多国家来汉，汉的威名更是传至大宛以西。同时，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汉王朝将自己的政治触手向西延伸，最初有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作为汉之使者、政令向西推进的据点，破楼兰、姑师后，汉列亭障至玉门，而伐大宛以后，亭障自玉门以西延伸到了渠犁以西，并且在轮台、渠犁屯田，汉王朝势力在西域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经济据点。汉与匈奴对车师的几次争夺，从武帝朝一直延续到了宣帝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③]，历经几朝，汉王朝终于实现了对西域两北两道的控制，匈奴设立在焉耆、危须、和渠犁间的僮仆都尉不再起作用，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另一个阶段。

---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3.1.2 渐趋全盛

宣帝神爵三年（前 59）设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康居诸国，颁布朝廷号令，实际上成为了西域最高行政长官。在此之后，西汉取代匈奴控制了西域，并继续贯彻武帝以来对西域的积极政策，政令经由都护颁行西域诸国，达到西汉对西域外交的全盛阶段，所谓“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①]

汉之政令通行西域，表现在汉王朝能够较为有效的对西域诸国政治的干预。其一，属西域都护管辖的西域国家国王及主要官吏由西汉正赐予印绶，

>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②]

只有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国绝远不属都护，西域大部分国家都得到了汉的封拜。有的从官吏名称的设置上便能判断一国的政治取向是否向汉；如渠犁、危须、焉耆等地的“击胡君”的设置，与汉王朝对抗匈奴的目标一致，而这三地恰是宣帝以前匈奴僮仆都尉之所，不难推断其设置是在西域都护之后，正处汉王朝对西域外交的全盛时期。其二，中央王朝积极清除妨碍汉朝在西域经营的不稳定因素。宣帝时五单于争位而分裂，东部呼韩邪单于亲汉，西部郅支单于杀汉使者，逃亡康居后互相勾结侵略西域诸国。元帝建昭三年陈汤、甘延寿远征康居，诛杀郅支单于，是出于对西域诸国安全的考虑，旨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如陈汤对甘延寿所说“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③]汉朝早已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下，而匈奴、康居的行为无异于是对汉王朝在西域统治的挑衅，长此以往“必为西域患”，甚至有再次称霸西域的威胁。当时陈汤矫诏发动了西域诸国兵配合汉王朝的进攻，是汉之号令通行西域的一种表现。康居在安息东北方、大月氏北方，是所谓绝远之地，本不属都护，经历了郅支单于事件后的康居，虽在成帝时遣子侍汉却仍桀骜于汉王朝，而汉王朝亦知其通商为实的外交目的，尽管如此，“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④]为了招徕远来西域之国以示汉王朝威德，尽管是康居这样的“绝域”国家，汉王朝亦未放弃对其的经营，积极之态势可见一斑，而至平帝后期，绝域国家逐渐不属于汉王朝经营西域范围之内，西汉时期对西域政策的又一分水岭大抵在此时形成。哀帝元寿二年（前 1），乌孙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来朝”显示出汉与乌孙的关系属于上下非对等关系，俨然已成为西汉的属国，根据西域传的记载，汉朝为乌孙指立过多位“昆弥”，显然是以中对乌孙内政的干预，梳理其中关联，

---

①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4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8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 3010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93 页。

不难发现这些昆弥和汉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亲近联系，或能有利于西汉在乌孙培植亲汉政权。后来大小昆弥在匈奴、康居的压力下，都是“亲倚都护”的，亦是借汉王朝之威的自我保护。

3.1.3 衰落和绝交

从宣帝时西域都护之设，至平帝末年以前，汉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上尚能承前朝之风，采取锐意进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然而早在元帝时，西汉社会已经险象丛生，昔日强大的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平帝登基后，王莽大权独揽，并最终篡汉自立，在中央王朝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面临着危机并最终走向崩溃。史书记为“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①]

“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都护）[校尉]领之。”[②]，汉自宣帝以来设置西域都护统领西域事宜，自郑吉起连续设置都护到平帝时，终废去都护以戊己校尉代行职权，显示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积极进取之态不复存在。姑句事件和唐兜事件便是汉王朝在西域统治瓦解的一个讯号，而匈奴势力再次在西域萌动：

平帝元始二年（2），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可以节省一大半路程，还可以避开“白龙堆”戈壁，戊己校尉徐普同车师后王商议此事却被拒绝。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初，楼兰、姑师等国便因不耐招待往来使者而怨恨报复汉使，帮助匈奴，但当时汉王朝同西域的外交尚处起步阶段，并且正在和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而此时，在汉王朝早已建立对西域的统治之后，车师后王再次以招待来往使者不便而拒绝汉王朝，无不反映出汉王朝的威信以不复从前，又或者说，汉王朝对西域诸国赋税过重，而汉长官刻薄寡恩，其与西域国家之间终于离心离德。[③]最后姑句叛汉投靠匈奴，此西域危机之始。其后不久，去胡来王唐兜屡次向都护但钦求救，而但钦未能及时救援，唐兜在逃亡玉门关而被拒绝入关之后，率众投奔匈奴，这是第二个脱离汉王朝的西域国家。两个国家都投靠了匈奴，显示出匈奴在西域势力此时又活跃起来，尽管王莽向匈奴讨要回二人，亦只能说明是汉之余威使然。王莽陈军西域，斩姑句、唐兜二人，与其说是对二人叛汉的惩戒以威慑西域其它国家，不若认为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此二人出逃本就情有可原，又有匈奴单于为之请罪，本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只可以解释为面临西域行将不稳的形势，汉王朝欲用雷霆手段以威吓其它国家，而这样却更加加深西域诸国的不满，如姑句决心叛汉时便是想到了车师前王被都护司马所杀，其后越来越多的西域国家叛汉。但钦作为西域最高长官被杀害，中央王朝却无力征讨，其在西域的统治渐趋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② （北宋）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 251《职官部四十九》，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第 340 页。

③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64-65 页。

瓦解。故中央王朝权力行将不稳的时候，武力威胁并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政令之行之有效需要有综合国力作为支持，这与当今世界“外交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亦是一致的

新莽时期，延续了中央王朝在西域统治的衰颓趋势，并最终走向崩溃。王莽继位后，“贬易侯王”改匈奴单于玺为章，又把西域诸王一律降为侯，这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西域与中央王朝离心并倒向匈奴，所谓“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①]

如前所述，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凝聚力越来越弱，至新朝车师后国再次降匈奴，即须置离事件。始建国二年（10），广新公甄丰出使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惧怕无力招待使者而获罪，想要投靠匈奴，引须置离所言“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道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②]可以看出，对车师后国而言招待汉使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国力恐不能继续支持日益繁重的招待成本，从前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不得人心便是因为赋役繁重，而现在的中央王朝与之何其相似，过重的财政负担是逼迫西域国家叛汉的一个重要诱因。须置离被押走时，国民知其有去无回而哭送之，可见须置离并非一个失人心的君主，但须置离最终为都护但钦所杀，西域人民的怨恨未尝不加之到汉人身上。须置离死后，其兄狐兰支尽率一国之众，举国降匈奴，这是平帝末年西域衰颓以来，西域国家最大规模的一次叛汉行动，它宣告着一部分西域国家已经彻底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而其后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更是不需多言。狐兰支投靠匈奴后，和匈奴联合起来攻打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西域诸国叛乱在即，而匈奴亦有卷土重来的危机，戊己校尉的副贰陈良、终带相约杀死戊己校尉，率二千余人投奔匈奴。陈良、终带作为中央王朝指定的西域官吏，最终也背弃新朝，进一步显示出西域局势动荡以及王莽的不得人心，至始建国五年（13），焉耆叛汉杀死都护但钦，中央王朝对西域的叛乱已无力管束了。天凤三年（16），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以讨焉耆，王骏遭焉耆、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围攻而全军覆没，李崇率残兵退守龟兹，曾经都护西域三十六国的汉王朝不复存焉，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已丧匈奴之手，自王莽、李崇死后，对西域的最后一点联系也被切断，西域遂不通。

3.2 东汉时期

历经西汉末年和新朝时期对西域关系的破坏以及王朝内部的战乱，当西域使团第一次来华请都护之时，“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③]，东汉王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5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朝建立之初未能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东汉初年，中央王朝企图假手莎车实现牵制匈奴、控制西域的目的，但始终未能恢复西汉时期西域都护政令通行西域那样的盛况。直到明帝年间对匈奴问题提上议程，与西域关系再次受到重视。与西汉迥异的是，东汉的西域经营之策随着政权更迭亦产生变化，因而产生了独特的“三绝三通”现象。

3.2.1 恢复和重建

《后汉书》中，将东汉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总结为“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①]，可见，东汉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并非如同西汉朝单一的“起始——高潮——衰微”结构，而是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在具体表现上，出现了两个经营西域的高峰时期。

建武五年（29），河西大将军窦融立莎车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总领西域，汉与西域的联系，在王莽时期一度中断之后又初有起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起色并不是指汉王朝重新和西域国家之间建立政治联系，而是刘秀企图借莎车之手牵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事实上，正因为莎车不肯归附匈奴，成为西域仅有的亲汉政权，使得匈奴始终无法控制全部的西域地区。康去世之后，其弟贤继任，开始莎车在西域的兼并经略之路。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②]，这是东汉以来中原地区首次和西域恢复联系，建武二十一年（45），车师前王、鄯善 、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以求都护，这次大规模的来汉事件似已表明，经历过西汉末年以来的西域叛汉之后，西域诸国再次为汉王朝的向心力吸引而渴望归附，请都护的请求没有被应允，但诸国为了寻求汉王朝庇护将侍子留在了敦煌。鄯善王安拒绝莎车王贤断绝汉道的要求，再次证明诸如鄯善之国的向汉之心。此时的西域，实际上是莎车、匈奴在角逐，光武帝仍无意在此争夺，所以面对鄯善再次请求都护的请求，回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尽管光武帝时恢复了同西域的交流，却并未实现对西域控制权的恢复，甚至到明帝永平八年（65）以降，“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③]，北匈奴携西域诸国再次威胁中央王朝西北边疆。

正是在这个时候，东汉王朝为了再次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政治目标，以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为始，“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④]蒲类海，位于新疆巴里坤县西北，这是东汉军队首次进入西域的记载，而后，随着军事上北击匈奴的进展，中央王朝开始重建它对西域的统治。明帝置宜禾都尉屯田于伊吾，掌控西域门户，其后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2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3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23《窦融列传》，第 810 页。

于寘诸国皆遣子入侍，《汉书》记为“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74），“奉军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①]于此，东汉首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在西域置官吏标志着中央王朝正式重建在西域的经营，是为“一通”。

3.2.2 两个发展高峰

明帝死后，焉耆、龟兹等国乘机杀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关宠于柳中。章帝继位，恰“建初元年，大旱，谷贵”，[②]中央王朝自身经济尚有危机，在此种时候，更无力经营西域，故“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③]在这种情况下，西域与中原断绝联系十多年，中央王朝同西域为之“一绝”。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王朝与西域断绝的同时，班超个人在西域的经营活动却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西汉朝所不曾有的情况，即在官方放弃对西域经营的同时，却有着非官方的力量继续维持其经营。明帝时，班超携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用政治和谋略使鄯善、于阗、疏勒归附，于寘诸国遣质子入汉，章帝时召回班超而班超去而复返，在中央王朝依然放弃西域的前提下开始其个人在西域的经营之路。随着班超在西域的进展，中央王朝断绝西域的心又发生动摇，章帝建初五年（80），以徐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④]，而在此之前，班超在西域所依仗者就是一同出发的三十六人以及西域诸国的军队。建初八年(83)，章帝接受班超联合乌孙攻打龟兹的主张，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令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尽管此时的中央王朝不复有大举出兵西域的动作，但通过对班超等人的拜官不难推测出此时的汉王朝已有经营西域之心，其授官正是对班超活动的肯定和支持。元和元年（84），章帝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人支援班超，这是中原王朝对班超在西域经营的又一次军事援助，可以说，从建初五年首次派兵增援班超以来，东汉王朝旨在西域扶持作为中央代言人的班超，希望借他之手重新建立对西域的威信和统治，这样一来，中央对西域的投入可以变得更小，胜则有利，拜亦无殆，这正符合统治者不愿花更多成本经营西域的心态。元和三年（86），班超攻下疏勒，打通了西域南道，章和元年（87）又攻下莎车，“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⑤]龟兹、姑墨、温宿皆降，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再次达到峰值。借班超在西域经营之功，和帝永元三年（91），班超被任命为都护居龟兹，又复置戊己校尉屯兵车师前部高昌壁，置戊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2《明帝纪》，第 122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29《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 1022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0 页。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76 页。
⑤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80 页。

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实现了政治、军事的进驻西域，东汉王朝迎来了其第一个经营西域的发展高峰，即班超担任西域都护至他卸任回汉期间，所谓“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①]在汉王朝的威望下，甚至前世不曾听闻过的西域国家此时遣使来汉，而汉人探索西域的脚步，随着班超副使甘英而到达了地中海东岸的条支国，拓宽了汉人眼界。

随着班超卸任和和帝、殇帝新丧，西域又一次叛乱，故安帝永初元年（107）“诏罢都护，弃西域”，并且罢伊吾屯田和柳中屯田，西域“再绝”，而北匈奴乘机吸收西域诸国，与诸国为寇边境十余年。元初六年（119），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田伊吾，欲招抚诸国，但很快便被北匈奴联合车师后王所攻杀，索班身死是为“索班之耻”。尽管邓太后同意在敦煌置护西域副校尉处理西域事务，此举只是同西域保持羁縻的关系，对西域无从控制，“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②]从明帝、章帝时最先在伊吾设置宜禾都尉，其后又将戊己校尉驻地设在“新道”沿线的柳中，此次索班伊吾屯田，正是东汉安帝再度经略西域的前奏。只是中央王朝虽设有官吏管辖西域事宜，却未能行之有效的控制西域国家，面对北匈奴和车师的入侵，寄希望于消极抵抗，西汉武帝时曾有的那种锐意，到东汉王朝实难再见。安帝延光二年（123），中央王朝采纳“西域三策”[③]之中策，“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此为东汉“三通”西域，中央王朝和西域关系又回到上升时期。在此期间，“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东汉王朝基本恢复了对葱岭以东国家的控制，塔里木盆地周围国家归汉，而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大宛等国没有再成为汉之属国。顺帝永建六年（131），东汉重开伊吾屯田，置伊吾司马一人，控制了西域门户，终于报当年“索班之耻”，这亦是东汉时期同西域关系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3.2.3 衰微和崩溃

自阳嘉以后，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又逐渐削弱，所谓“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④]桓、灵时，史书中仍见汉对西域设有西域都护、长史等官发西域诸国兵，如灵帝时凉州刺史尚能发动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之兵毋宁说这是对前代统治之惯性使然，也是东汉王朝为西域所做最后挣扎。安帝以降，东汉社会已然动荡不安，灵帝时内有党锢之祸、宦官专权，外有张角黄巾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0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1 页。

③ 《后汉书》记：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为对付北匈奴上书陈西域三策，以为“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

④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2 页。

起义和各州军阀割据，东汉中央政权已然分崩离析，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必将随着中原王朝的政治混乱而日薄西山。

顺帝永建四年（129）于窴王杀拘弥王，并自立其子为拘弥王，两者虽都遣使来汉，但俨然已经暴露出西域经营兴盛之下的潜在危机，即西域属国企图越过汉王朝的统治自决杀伐。到桓帝元嘉二年（152），西域长史王敬杀于窴王而又为于窴侯将输僰所杀，斩王建的头颅悬首于市以示报复。斩杀汉官员影响相当恶劣，应当从严初置，敦煌太守马达闻讯欲出兵击于窴，然而桓帝竟然不许，召回马达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宋亮到达于窴后“竟不能出兵”，西域长史被杀应属重案，一件如此恶劣的事情最后却为汉王朝不了了之，无异自扫威严，而于窴则因此更加肆无忌惮。灵帝熹平四年（175），于阗王安国再攻拘弥，原本“口七千二百五十一”的拘弥在于阗攻击下只留千口，可见诸国倾轧斗争之严峻，而东汉虽发兵立拘弥王，却并未初置祸首安国。对于两次在西域闹出大动静的于阗国，东汉政府却听之任之，这种放任的态度势必滋生诸国轻慢之心，东汉自班勇屯兵伊吾以来在西域地区树立的统治威严或者说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向心力，行将瓦解。

桓帝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因与戊部候严皓不和而叛汉，攻击车师后部屯田区后又逃往匈奴，于是汉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卑君立后，阿罗多回来争位，照理说阿罗多作为叛汉的罪人应该被处罚，西汉时便是如此初置叛汉诸国，然而“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戊校尉阎详担心阿罗多会招来北匈奴，为了所谓和平竟收回了卑君的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阿罗多事件的初置结果再次说明汉王朝在西域经营已不堪一击，故而朝令夕改，逃避忍让，一般认为该事件是东汉的西域经营走向崩溃的标志之一。灵帝建宁三年（170），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征讨疏勒，围城四十余日仍不能攻下，这使得汉王朝在军事上已不能对西域形成压力，而没有武力作为保障的西域经营实难维持，故“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①]

综上，东汉末年中原内部势力尚且四分五裂，在此时分力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实属勉力，是故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逐渐在政治、军事上全线崩溃，它表现在：政治上不能平定西域矛盾，既包括中央王朝和西域国家的，也包括西域诸国之间的倾轧；军事上不能兵讨叛乱，委曲求全，故而中央对西域的威信日益沦丧。西域与中原的关系大抵也在灵帝后期中断，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自此终了。

---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7页。

3.3 两汉对西域外交之比较

就两汉中央政权而言，尽管东汉对西域政策极大的继承自西汉，但在其运行和结果上都存在着差异，就其时代背景来看，汉王朝边境最强大的对手匈奴在东汉时仅能滋扰河西边境，已威胁不到中央王朝政权的稳固，因此其联合西域的迫切性有所降低，并逐渐滋生了东汉王朝的“守势”思维，从而影响其对西域政策的制定。

3.3.1 差异

两汉王朝是一个比较连贯的统治时期，虽有王莽之乱，但在东汉建国以来各项统治措施得以拨乱反正，保有对西汉的延续性，这一点表现在中央王朝对西域政策上亦是一致的。纵观两汉对西域之措施，皆有遣使、纳质、联姻、置官吏、屯田及各种军事手段，而就两汉时期对其它少数民族的管理措施，也大抵如此。但同样的施政措施无论是在其实施还是结果上两汉王朝却表现出来许多差异，本节试对这些差异及其成因进行阐述。

其一，政策稳定性差异。通过前文对两汉时期经营西域状况的分析中，能够明显察觉此差异，较西汉时单峰值型发展趋势而言，东汉表现出来的是波动式多峰值的，换言之，西汉经营西域政策是相对稳定的，而东汉则表现为波动有弹性。西汉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和西域之关联日益紧密，鼎盛于宣帝朝而衰颓自平帝以降，以西域都护的设置为例，自郑吉为第一任期都护起至王莽时，中央政府在西域连续设置都护凡十八人，除特殊情况外西汉之都护任期大多为 3 年。作为管辖西域最高长官，有序的任命和换届有利于保证中央对西域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即使到了西汉末年乃至王莽朝，中央仍持续任命西域都护，随着最后一任都护李崇之死，中央同西域的最后一点联系也被切断，故都护的存在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经营是一致的，都护不复存在而与西域关系随即断绝。而东汉时中央王朝和西域的关系却经历着反复，与政治上三通三绝相呼应的是在西域置官吏和屯田的三通三绝，其官员任命远不如西汉那样稳定有序换届，尤以班超个人担任西域都护时间为最，更多的时候，东汉以长史、校尉等官吏代行都护职权，这种差异正体现出东汉对西域控制力的削弱，而频烦变动的对西域政策更加剧西域诸国同汉的离心力，它更加恶劣的影响表现在凡东汉中央王朝皇帝更替时便往往伴随着西域诸国叛汉，形成恶性循环。

其二，经营主导的差异。西汉以官方为经营主导，故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东汉时以班超在西域经营而看，他的初衷并非是东汉政府想要经略西域，相反此时的中央是放弃了对西域经营的，是受到班超经营结果的影响才逐渐想要重建在西域统治，因而两汉王朝在经营主体上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差异。所谓官方

的经营，即是由国家作为外交的主要推动力量，汉王朝首通西域的外交使节便是由招募而来，“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①]作为外交中重要媒介的使节，其来源或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属性，尽管他们之中存在着某些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但总的来说其出使是在国家的授意下才得以顺利开展的，其本身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尤其是武帝是对大宛的征伐，本是天子好宛马而不得，十分显著的体现了统治者的强权意愿附着在外交手段上，也正因为有国家支持，才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个表现就是外交成本的投入上十分庞大，所谓“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②]终西汉一朝，其在西域的经营活动也大抵是与国家对西域政策相一致的。国家主导下的外交，需要有相关机构和官员执行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二者缺一不可。是故东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不能全以官方经营概之，甚至非官方经营下的外交活动——如班超在西域的贡献，其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输于国家为主导的外交，这是两汉王朝又一显著差别。班超经营西域之时，章帝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又罢伊吾屯田，中央王朝此时对西域政策已然放弃，所以班超在西域的积极活动与国家整体政策并不是一致的，不能代表当时的国家意愿。随着其经略西域的进展，中央王朝虽有所动摇，但并没有彻底更改原有的外交政策，再从东汉王朝历次发兵西域支援班超的人数而看，仅千人之规模，这和武帝伐大宛时数万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应当指出的是，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并不能说明东汉王朝国家主导下的西域外交便不如外交家的贡献，班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除了其个人因素以外，亦得益与当时匈奴衰弱的大前提条件，按《资治通鉴·汉纪四〇》胡注所言，时值“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颇有时代造就英雄的味道。

其三，使者功能性差异。汉武时方通西域，故使者出使时常有探索性之功能，它表现在使者还朝之后或言西域之风土人情，或奇珍异兽，在《史记》《汉书》的撰写中亦能感受到这一点，其对诸国不同于汉王朝的奇风异俗颇有描写，迎合统治者对异域“奇物”的兴趣。历经西汉时期对西域的交流直至西域都护开府，中央王朝实现了对西域的控制，自然其使者的探索性功能不再重要，至东汉朝时使者更突出其政治性作用，成为东汉经营西域政策的象征。此外，联姻西域的和亲女作为使者的一种，西汉使用这一外交手段改变了乌孙亲匈奴的政治立场，从而为驱除匈奴夺取西域控制做了准备。东汉时，匈奴分裂，和汉王朝作对的北匈奴至多只危机河西，对汉之国本无从动摇，汉王朝已没有必要再联姻西域国家，故而东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姻未见明确记载，和亲女这一使者的联合西域以抗匈奴的功能明显丧失。

---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其四，竞争对手的差异。通过上文可以看到，无论西汉、东汉之经营西域，皆受到了来自匈奴的影响，武帝时出使大月氏和乌孙都是为了联合抗匈，尤以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祁连山之役，北拒匈奴从而为汉王朝在西域之发展扫除障碍。至东汉时，亦是以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为始，企图重新构建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经营。可以说，作为西域角逐的主要对手，两汉王朝经营西域都曾抱有“断匈奴右臂”的想法，而西域国家则在强国之间摇摆依附。但东汉朝的在西域竞争对手却不止北匈奴，作为西域绿洲国家的莎车试图称霸西域，莎车王贤自恃兵力强盛，攻鄯善、龟兹，灭妫塞王，伐大宛，并于窴，贤自称大都护，向诸国收纳赋税，而“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俨然莎车已独霸西域。莎车的崛起，与同时期北匈奴的衰弱有关，建武二十四年以后，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而北匈奴未能完全放弃西域，换言之，东汉若在此时重开西域经营，其最大的对手不是北匈奴而是莎车。东汉王朝和北匈奴都企图借助莎车之手实现对西域的控制，但就其结果而言莎车王贤的行为更像是继匈奴、汉之后意图控制西域。贤死之后，少了这一控制，西域内部诸国兼并：“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窴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1]再观东汉时，凡中央对西域政策稍有松弛，诸国便复又蠢蠢欲动，西域绿洲大国兼并，成为东汉在经营西域上的又一大阻力。

3.3.2 成因

本节试对以上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

其一，两汉王朝经营西域的目的不同。

西汉的西域经营，正符合张骞所描绘的“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2]自秦始皇以来，西部边界不过到陇西，而西汉王朝经营西域之景象，《汉书》记载：

>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3]

汉王朝西陲疆域拓展，以今新疆地区为主体的广大西域国家一并受汉王朝统治，可谓广地万里。来自西域的奇珍及各种风土人情随着“重九译，致殊俗”这一目标传入中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于斯为盛，又有各国朝贡、遣子入侍，既是致殊俗又是威德遍于四海的一部分。汉王朝款待四方来客，以示汉王朝之富庶，

①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09 页。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66 页。
③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第 3928 页。

更体现其威德，《史记》载汉武帝时一段足矣说明：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①]

这段记载为我们还原了一场及尽奢华的外交盛宴，丰厚的回报更加刺激了西域诸国访汉的意图。而到了东汉年间，安帝延光二年尚书陈忠的一封上疏则曰：

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②]

可以看出，东汉朝对西域的经营目的旨在制匈奴和保河西，不复见西域朝“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壮志，更偏向消极、保守。其从屯田这一政策的选址亦可窥见，东汉朝屯田仅扼住西域门户伊吾、楼兰等地,以此防范匈奴寇边，为防守之势，而西域之开屯田随着中央王朝政治势力的向西延伸而西进，屯田积谷以应对战争，是攻势的表现。正是两汉经营目的上不一致，故在实施其政策时二者体现出差异。

其二，时代价值取向的不同。

同西汉王朝锐意进取的价值取向相比，东汉朝则偏安保守，而这种取向的差异，对二者的外交目的和执行都产生了影响。正因为东汉朝的偏安保守，建武年间西域诸国来请都护才遭到拒绝，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不许之，故东汉建国之初未能恢复同西域的外交，在此影响下的西域政策亦容易动摇，一经叛乱便遭弃之。引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之说，东汉政府不愿在西域经营上投入过多成本，这一认知亦是有迹可循，在前代经营西域中，西域国家在中央对其控制力削弱时便容易出现背汉投靠匈奴的行为，再加上中原地区传统的华夷有别观念的认知，二者合作和交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上，因此中央王朝难以和西域诸国形成完全信任的合作关系，所谓“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③]。因此，当西域地区出现威胁时，东汉朝丧失了前代挥兵西域的魄力，而偏安固守河西。引班勇所言：“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有昼闭之儆矣。”[④]东汉经营西域的两个高峰皆由班氏父子缔造，尤其是班超在西域的经营却有前代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第 3173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2 页。
③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12 页。
④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 1588 页。

进取之风，然而从班勇于元初六年这段上议，其开西域的目的仍在却匈奴、保河西，不见西汉时那种经略西域、开疆拓土的风发意气，班氏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第4章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对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方式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归纳了两汉对西域外交的演变过程。

政治方面，使者作为外交媒介是两汉对西域外交政策的重要执行人，是外交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在早期对西域的经略政策中，使者充分发挥着其探索性职能，这些“相望于道”的使者们充当着开拓异域的急先锋，并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式交流，通过使者的往来，中央王朝和西域的之间的隔膜被打破并逐渐联系在一起。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使者出使职能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遣使、联姻、纳质、置官吏都是使者外交职能的分化，即按外交任务被赋予某种职能的特殊的“使者”：联姻，即女性主导下的外交活动，和亲女因肩负的政治使命在外交中发挥了常驻使节的作用。如西汉之和亲乌孙，就是为了实现联合西域对抗匈奴，汉先后遣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相夫公主等和亲女出嫁乌孙，在经营西域、对抗匈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悬泉汉简》载：

> 上书二封。其一长罗候，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驿）骑当富，县（悬）泉（驿）骑朱定付万年（驿）骑（Ⅱ0113③：65）。[1]

简中提到的就是乌孙公主在联姻政策下传递西域情报的重要功能。和亲女的派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同西域、同匈奴之间的较量，和亲是双方友好关系的见证，而外交恶化或不再需要和亲来稳固政治联合之时便将其废除，到东汉朝，随着匈奴对中央的威胁的削弱，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和亲行为已鲜见于史书记载中。除了和亲女本身，以其为中心衍生的和亲使团和各种使者，在东西外交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再次佐证对西域外交政策的执行实质是使者职能的分化。纳质在两汉对西域外交中也很常见，通过质子这个桥梁，有助于维系汉和西域国家之间的关系，培植西域亲汉势力，并向西域输送汉文化。比较典型国家的是莎车，

> 元帝时，（莎车王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2]

莎车王延在其年少时便入汉生活，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所谓“复参其典法”，可见其对汉家典章制度的学习了解，并将它们带回了西域母国。王莽以后，匈奴在西域势力死灰复燃，而莎车始终是坚定的反抗匈奴政权，使得匈奴未能在此时一统西域，其原因未尝不与质侍制度下所形成的文化羁绊有关。“质子”一词在东汉时演变为“侍子”，这一称呼的变化，正是两汉经营西域成果的一种映射，西域自都护之设置后内属于中央王朝，而中央王朝凭借其国力的绝对优势同西域诸国建立了单向的、非对等的纳质行为。随着两汉在西域经营和匈奴式微，纳质

①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137 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8《西域传》，第 2923 页。

的意义已经由见证盟友关系退化为友好亲附的象征，外交地位不平等日益加剧，因此在称谓上亦做出了改变。纵观两汉时期对西域的质侍特点，多以君主的亲属尤其是君主之“子”作为质子，这是汉代同古代“交质”体系的又一差别，一定程度体现着在儒家文化体系的影响下中原地区宗法、血缘关系的渗入。质子作为纳质方君主的代表入汉，多为国家未来的继承人选，故他们在汉期间得以参加各种重大活动，例如上陵礼[①]中规定与会的人就包括“外国朝者侍子”[②]，诸国侍子和汉王朝公卿百官一起共襄盛会，既是维护友好关系的象征，而参加这种成为汉之典章制度的高规格盛会更说明入侍者身份的特殊。而官吏的设置，是汉王朝同西域关系在职官制度上的反映。在专门的处理西域官员出现之前，有诸如大鸿胪、使者、校尉等领少数民族事宜，而随着经营西域政策的推进，原有的中央-地方行政体系已经难以匹配日益庞大和复杂的西域事务，因此中央王朝对地方行政做出调整，尤其以西域都护的设立，成为中央政府所设置的专门管理西域事务的最高官吏，西域所置官吏朝着专门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央又设置戊己校尉作为其副官，协助都护共同管理西域。笔者认为，官吏的设置也属于使者职能的分化，即朝着专门的、稳定的政治性功能转换，以西汉时西域都护的任命为例，历任 18 位都护都由皇帝任命，基本按三年一替，代表中央王朝行使管理西域的权力，[③]所谓“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西域都护有对归属西汉的西域诸城郭国进行管理、征伐、调兵、安抚、监督等权力，使得“汉之号令班西域矣”，都护之置稳定而有序地建立和维护了中央在西域的经营政策，都护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域的代言人。就西域国家而言，他们设置的部分官吏则成为其政治立场的反映，比起入汉朝贡的使者更增添政治意味。

军事方面，包括武力威胁和战争两种外交方式。武力威胁即指除大规模战争以外的一切对抗性手段，包括骚扰挑衅、杀使者、刺杀等，相较于战争，武力威胁对于双方国力的消耗很小，更多的时候其背后是西域诸国在匈奴的授意下与汉王朝形成对抗。当武力威胁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时，其最终将演变为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包括几种类型：其一，汉王朝直接出兵西域的战争，如楼兰、姑师之战、大宛之战等，此类战争往往投入较大，如李广利伐宛时，前后将兵十余万人，所费物资更甚，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最大限度的用军事力量震慑西域诸国，确立汉王朝的威信；其二，汉匈西域争夺战下的对抗，比较典型的就是西汉与匈奴五征车师，争夺西域门户的控制权，此种战争下汉王朝并非独自出兵，而是联合西域诸

---

①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开始实施，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以及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合并至陵寝处成为“上陵礼”，并建筑了举行仪式的大殿，成为汉代陵寝祭祀定制中唯一由天子亲临、规模最大的大型典礼活动，推动汉代帝陵祭祀由陵庙祭祀为主向陵寝祭祀为主的转变。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 84《礼仪志上》，第 3103 页。

③ 参见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国的力量共同对抗匈奴势力，尤其是东汉朝，每发兵西域，往往都会调动西域各国兵力，正符合“以夷制夷”思想的体现；其三，西域国家在匈奴策划煽动下攻击汉军，西域小国的国力难以和汉王朝抗衡，又加以他们亲汉的传统，因此此种情形的战争多发生在汉王朝黯弱、在西域权威动摇之时，中央王朝无心西域经营也无暇报复诸国，让匈奴趁机得以扶植反汉势力。总之，汉王朝对西域的军事手段是服从于经营西域政策的，它向西域诸国有效的显示了国威，从而起到震慑诸国的作用，为汉王朝在西域经营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与军事手段相配合的是汉王朝的西域屯田政策，通过屯田使得中央王朝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以向西域延展，两汉屯田选址（西汉在伊循、车师前后国、渠犁、轮台，东汉亦有伊吾、楼兰）都具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一方面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如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在此处屯田积谷颇有收成，能在后方提供物质支持；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上是贯通东西的交通要道，扼住“西域门户”和军事要冲，在战略上获得对抗匈奴、夺取控制西域的主动权，向西域诸国表明了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决心，并对诸国起到震慑的作用。

自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后至东汉末年，中央王朝同西域的交往历史有三百余年，其中维持正常关系的约有二百余年，尤其是宣帝神爵二年（前 60）至西汉末，东汉明帝末至和帝末，这约百年的时间中中西双方往来畅通无阻。至于民间的往来，则更甚于以上数据，早在张骞出使之前，便有通商的记载。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交往关系中，尽管在政治上的关系经历着变化，但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上维持着相对稳定的互动，表现在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相互影响上。经济方面，本文从农牧业、工商业两个方面归纳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交往：农牧业方面，表现在东西方物产的互动，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马匹、骆驼等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国传统的作物如桃、杏传入西域地区，丰富了双方的物质文化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西域马的引进，改善了我国内地马匹的品种，对于两汉王朝骑兵力量的培养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手工业方面，其一表现在东西手工业产品的互动，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西传，而具有西域特色的毛皮织品传入内地；其二表现在汉王朝先进的生产力对相对落后的西域地区的影响上，中西方交流为西域带去了汉人先进的冶炼技术和灌溉技术，客观上促进了对西域地区的开发。同时，在手工业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在双方传统手工业中融入了其它文化的元素，表现出中西杂糅的特点，这在许多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证实。商业方面，中西方既存在等价交换下的商业贸易，也存在非对等的朝贡贸易。中西方商业贸易能带来巨额的利润，甚至吸引着以政治目的出使的使者转型为中西方的商人，而其贸易范围已不限于中央王朝和西域诸国之间，至远到达了南亚、欧洲；朝贡贸易体系下，则是以汉王朝对西域的投入为主，借

以扩大汉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宣扬国威。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两汉时期以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开辟了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东西方使者、货物经丝路来往穿梭，文化交流汇集于此，汉王朝积极构建以丝路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体系，它是汉王朝和平的、包容的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华文明，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而是希望同重要的战略利益契合国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固的盟友关系[①]，这种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差异性基础上，两汉王朝实现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但不等同于后世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汉天子希望四夷臣服的同时又往往对其“统而不治”,令夷狄出于相对自由的状态[②]，而倡导西域各民族间“以夷制夷”，而借助丝路则可以传播汉王朝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总之，和平外交是通过丝路所传播的主流外交理念，但汉王朝也不排斥特殊情况下使用武力来应对威胁。

文化方面，中国传统的杂技歌舞、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了汉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而汉王朝亦向西域输出了汉家礼仪文化。在中西交流过程中，语言文化方面的互动不容忽视，《汉书》中便有和亲公主学习乌孙语言的记载，出土资料亦可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学习汉语、使用汉朝的书写材料（如简牍、纸）的事实。在宗教上，佛教的东传在此时完成，到东汉末年，佛教已经由宫廷传至民间，并且佛教影响下的建筑、绘画、文学艺术亦逐步渗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以上是对两汉时期对西域外交的组成具体内容的横向剖析，纵向梳理其发展脉络，本文对此时期同西域外交的演变过程进行归纳。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同西域的发展关系呈单峰式发展，自武帝建元年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双方关系在探索中逐渐发展；至宣帝神爵三年西域都护的设置和开府，迎来西汉对西域外交的全盛阶段，其表现在西汉王朝取代匈奴控制了西域地区，政令为西域国家所遵守和执行，并且能有效的实现对西域国家实现管理和干预，而西域都护成为中央在西域的政治化身；平帝后期，是西汉时期对西域外交的一个分水岭，此时中央王朝对西域政策较前代已出现偏差，即逐渐将偏远的“绝域”国家排除在经营范围之外，并且最终罢免西域都护而由戊己校尉代之，汉王朝对西域实现控制的一个重要标志丧失，它宣告着以往的进取的外交态势逐步转变为了消极、保守的态势；伴随中央王朝内部的由盛转衰，西汉时期在西域的经营渐趋瓦解而至崩溃，姑句事件、唐兜事件是经营渐趋瓦解的信号，而须置离事件和狐兰支降匈奴的事件则彻底宣告中央王朝在西域经营的溃败。值得一提的是新朝末年戊己校尉贰副陈良、终带相约杀戊己校尉并投向匈奴，这是汉人本身对中央王朝的叛变，是对

① 许正《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塑造》，《学术界》2015 年第 11 期。

② 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1 期。

王莽政权的不满所致，由此可见新朝时在西域经营的衰落的原因之一无不与中央政治权力斗争有关。东汉时期同西域外交关系受时代背景、外交策略等多方面的影响，表现出波动性变化的多峰式发展。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遣使贡献成为破冰之行，中央王朝首次恢复了自新莽末年切断的同西域的联系，建武二十年，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以西域国家的主动来汉加强了中央王朝同西域的联系，但此时并未建立前代那样的的统治权威，西域小国在匈奴的影响下随时骚扰着汉王朝边境；直到明帝朝以北击匈奴为契机，于永平十七年以后恢复都护和戊己校尉的设置，再次实现了中央王朝政治上对西域的控制；在章帝以来迎还都护、放弃西域的大背景下，班超个人在西域的经营活动卓有成效，西域臣服，于和帝永元年间迎来了东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首个高峰；安帝延光二年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在班勇的经营下，以顺帝永建六年重开伊吾屯田为标志，这是东汉时期西域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阳嘉以后，东汉末中央内部权力混乱，外则有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汉王朝在西域的经营逐渐衰微，表现为西域大国的崛起（如于阗），它们对内倾轧、兼并西域国家，对外则不受汉王朝约束，与《西域传》所载“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基本相符合；以桓帝永兴年间的阿罗多事件为标志，东汉对西域经营逐渐走向崩溃，中央王朝丧失了对西域的管理能力。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两汉时期对西域外交比较后，总结了如下几点差异：其一，政策稳定性差异。西汉经营西域政策是相对稳定的，中央制定的政策与其执行趋于一致，而东汉王朝则表现为波动式发展，随着中央政权的更替对西域政策亦发生动摇，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一定能趋于一致，例如班超在西域的经营就是与中央放弃西域的外交政策相违背的。其二，经营主导的差异。西汉以官方为经营主导，因此外交成本的投入有国力作为依托，可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表现在大规模封赐物品和战争的运用；东汉王朝则表现出官方与非官方并用的特点，甚至非官方主导下的经营效果不亚于官方。其三，使者功能性差异。西汉前期，汉王朝和西域之间尚处于互相了解阶段，使者的探索性功能明显，即开拓异域、宣扬国威，随着双方了解的增强，这种职能逐渐朝政治性转变，动机较前代更具有功利性——强化了对外交活动作用的重视程度。其四，竞争对手差异。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匈奴都是影响西域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共同目的都离不开“断匈奴右臂”这一策略。尽管宣帝时日逐王降汉标志着匈对西域的放弃，但这是在汉王朝国力下的被迫选择，匈奴分裂后，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并逐渐汉化，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东汉时其策动西域国家与汉王朝对抗成为边境威胁。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而后东汉军又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

奴军，迫使其西迁，终于将北匈奴势力驱逐出西域。与西汉不同的是，除了匈奴这一竞争对手，西域大国的崛起也威胁到了中央王朝的权威地位，尤其以东汉初年的莎车国最为典型，莎车王贤的时代适逢东汉的消极政策和匈奴的衰弱时期，因此莎车几乎成为了独霸西域的国家，而到了东汉后期，中央王朝不能对西域诸国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诸国兼并而不再受汉王朝制约。

造成两汉时期这种差异的成因则在于两汉王朝经营西域的目的以及时代取向各不相同。西汉时的西域经营，正符合张骞所描绘的“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这一目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在与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东汉对恢复西域统治的契机也在于对抗北匈奴，“断匈奴右臂”是强大的汉王朝之所以联合西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王朝构建起在西域的经营秩序之后，实现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化则成为其主要目标，诸国或遣使朝贡、或派遣质子入汉，汉王朝则通过遣使、联姻、置官吏、战争等途径向西域地区渗透汉文化，无不显示着汉王朝对西域国家树立的绝对权威，西域物产风俗涌入内地，则更凸显经济上的影响。以汉武帝时期西域经营为例，武帝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①]他希望周边少数民族来汉贡献，确立以汉王朝为中心的华夷体系，正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在地缘上的体现，此时历经七十几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繁盛，因此在这个理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在位期间[②]，表现出进取而积极的外交态度，故能实现“凿空西域”的创举。《史记》记载：

>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③]

在对待西域使者上，汉王朝不遗余力展现国家的富庶，从而达到宣扬国威的功效，即“威德遍于四海”。而汉武帝以后的君主则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候对西域的外交框架，至西域都护的设立总领西域诸国，成为“大一统”的突出表现。再观东汉王朝，则趋于保守，仅围绕制匈奴和保河西开展外交经营，在继承前代外交体制的基础上，缺乏外向的开疆拓土的精神。光武帝刘秀本人“在兵间久，厌武事”[④]，他厌恶战争，自然延伸到对待少数民族事宜上也不愿过多征伐，那么，在光武帝时未能恢复对西域的经营就很好理解了，刘秀认同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⑤]，此时并非统御四夷的好时机，因此国家不愿意在此时投入外交运营成本，崇尚文治而非武治。再加上从前代经

---

①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5《泰山刻石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第44页。
② 汉武帝执政晚期，以《轮台诏》为代表的政治思想的转变不包括其中。
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④ （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43《汉纪三十五》，第1381页。
⑤ 崔明德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36-237页。

营西域的经营教训中发现，西域地区的向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难以长期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驯服，而此时来自匈奴的威胁也仅限于河西，因此东汉王朝放弃了前代的征伐体系而选择了以羁縻政策维系中央王朝同西域的关联，对于战争的运用十分谨慎，从整体来看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战略。

外交虽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但外交家在外交活动中亦产生的重要贡献亦不能被忽视：如张骞这样的先行者，敢做前世未有之事，凿空西域，开启同西域交流的大门；又如冯嫽，用政治智慧周旋异国，兵不血刃而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稳定；再如班超，以三十六人出使而至最终平定西域，坚守西域三十载，斡旋诸国，以尽可能少的成本维系着西域经营。这些优秀的外交家都有着共同点，即敢为人先的魄力、坚定不移的毅力和报效国家的爱国之心，这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目录

一、古代文献资料

[1]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

[2] （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

[3]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出版。

[4] （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

[5] （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出版。

[6] （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出版。

[7] （南宋）徐天麟编《西汉会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8] （南宋）徐天麟编《东汉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9]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出版。

[10] （清）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出版。

[11] （清）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12] （清）王先谦撰《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

[13] （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出版。

二、考古资料

[1] 翁方纲撰《两汉金石记》，上海：上海博古斋 1924 年出版。

[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4] 袁维春编《秦汉碑述》，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出版。

[6] 孙慰祖，徐谷富编著：《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7]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8]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三、研究著作

[1]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

[2] 陈竺同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3] 安作璋著《西汉与西域关系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4] 安作璋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济南：齐鲁书社 1979 年出版。

[5] 张维华著《西汉西域都护通考》，济南：齐鲁书社 1980 年出版。

[6] 岑仲勉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出版。

[7] 余太山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8] 田继周著《秦汉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9]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10] 林剑鸣著《汉武帝》，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11] 崔明德著《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12] 崔明德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13]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出版。
[14] 王子今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15]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出版。
[16]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出版。
[17] 黎虎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
[18] 马晓娟编著《历代正史“西域撰述”探略》，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19] （日）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出版。
[20] （日）藤田丰八著《西域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四、相关论文

[1] 郭庆龙《西域诸国考略》，《史地丛刊》1923 年第 2-3 期。
[2] 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 年 7 月第 1 期。
[3] 李溥荫《两汉对外之发展及其教训》，《新亚细亚》1936 年 8 月第 2 期。
[4] 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青年中国季刊》1941 年第 2 期。
[5] 邢义田《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史原》1974 年第 5 期。
[6] 敬东《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甘肃社会科学》1980 年第 2 期。
[7] 丘进《略论汉代西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1987 年第 4 期。
[8] 崔明德《西汉、唐与少数民族和亲比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9] 殷晴《汉唐民族政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10] 李大龙《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
[11] 李大龙《西汉“和亲”政策新论》，《民族研究》1993 年第 4 期。
[12] 黄今言《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13] 赵贞《汉代戊己校尉阐释》，《敦煌研究》1999 年第 4 期。
[14] 陈立柱《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新论》，《安徽史学》2000 年第 3 期。
[15] 曹金华《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2003 年第 3 期。
[16] 赵娜《浅析汉武帝时期的边疆政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17] 王玉功《简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 年第 2 期。
[18] 马晓丽《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19] 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1 期。

[20] 刘永强《2000年以来两汉西域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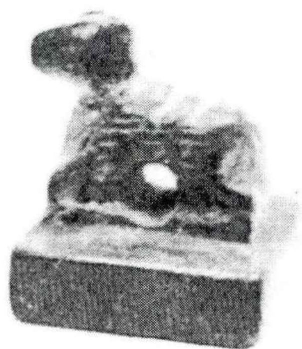
[21] 李炳泉《十年来大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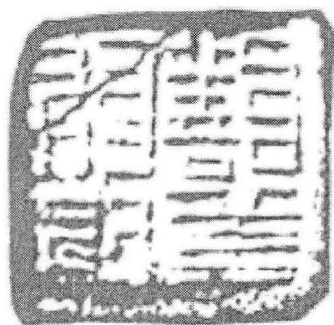
[22] 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3] （日）西村真次《乌孙与汉之同盟》，东白译，《史地半月刊》1936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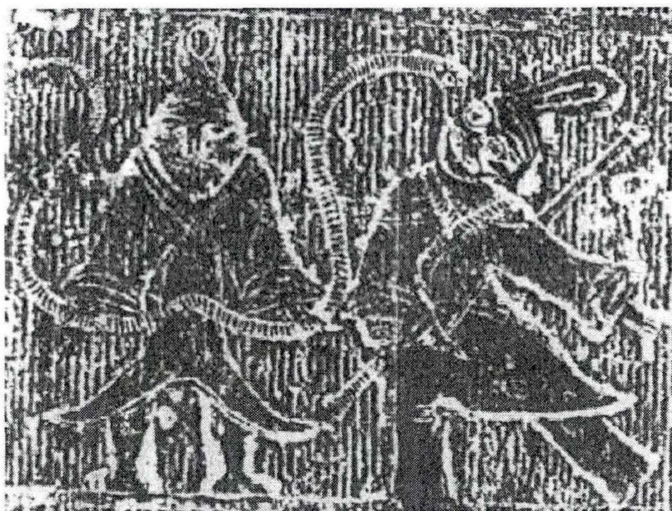
[24] （日）桑原骘藏《张骞西使考》，何铁山译，《亚洲文化论丛》1944年第3期。

附　录





图一　“汉归义羌长”印[①]　　图二　“鄯善都尉”印[②]



图三 刘村洪福院画像第 2 石（节选）[③]

① 《文物》1975 年第 7 期，图版捌：1。

② 尼雅遗址 93A27 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牍封泥印，图片参见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彩页图版二，齐鲁书社 1979 年出版。

③ 朱锡禄编著《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第 10 页。节选石像中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左一人双手普持蛇舞弄。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1]黄尧慧《读〈制造汉武帝〉》，《读书文摘》2017年第7期。

致 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来到湘潭大学已经三年了。值此毕业之际，不禁感慨万千。在这三年里，学习和生活遇到了很多困难，老师、家人和同学给了我很多帮助，让过渡过难关，走到了毕业。三年读研生活，我不敢说自己在学习上有很大的进步，至少对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受益匪浅。现在快要毕业了，我要对那些陪伴我走完读研生涯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李斯老师，李老师专注于秦汉史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视对简牍材料的运用，这和以往本科期间的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研一开始，李老师每周带领师门一起读前四史，为了保证课堂讨论效果，每次上课前我们都会查阅许多和史料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并做成总结归纳，每月至少需要写作一篇札记，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古文阅读水平以及写作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在老师的引导下，我逐渐确定了自己感兴趣的论文研究方向，由最开始对班超个人事迹的讨论，拟定为研究两汉时期同西域关系的演变，期间老师为我指明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对论文的框架构思都是十分有帮助的。研二开始，师门又一起进行简牍阅读，这在以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通过对简牍中秦律的学习体会，提升了我对简牍材料以及论文的认知水平，可以说，简牍资料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因而在我的毕业论文中也运用了部分简牍材料。感谢导师对我论文撰写和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更感谢导师三年来的教诲，让我的学术能力和认知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将终身受益无穷。

其次，感谢中国古代史专业吉成名教授、雷炳炎教授、徐芬副教授、蒋波博士等老师。感谢他们在毕业论文开题和预答辩的时候提出宝贵意见，使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同时，感谢同门师妹刘璐，正是在讨论课上各种观点的碰撞，才汇聚成论文写作中的灵感；亦感谢同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家人这么多年来对我无怨无悔的付出。感谢他们在我读研期间，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

黄尧慧

2018年5月